

粉彩黃地月季紋瓶　清乾隆
朝鮮　和柔翁主（1740-1777）墓出土
韓國　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白瓷青畫壽福紋多角瓶　朝鮮
十九世紀　韓國　個人所藏

臺大藝術學



十九世紀朝鮮王室所用的清代琺瑯彩繪瓷器　韓國　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粉彩四節花卉紋碗及碟　清　十九世紀　首爾東大門運動場出土
首爾歷史博物館藏

臺大學術期刊

DOI: 10.6541/TJAH.202403_(56).0003

傳入朝鮮王朝的清代琺瑯彩繪瓷器及其接納狀況的初步研究*

金恩慶**

【摘要】朝鮮在以儒家政治為基礎並崇尚節儉的國家基調下，雖然以無紋的白瓷消費為主，但從十八世紀中後期開始，中國的彩瓷消費和流入情況正在增加。特別是以朝鮮王室為中心，進入清代新生產的被稱為「法瑯」或「洋磁琺瑯」的新品種不斷引進，這一點值得關注。這很有可能是清朝皇室所製作的「瓷胎畫琺瑯」或「銅胎畫琺瑯」等的畫琺瑯。出土及傳世品也與朝鮮王室有關，大部分以十九世紀末期景德鎮民窯生產的粉彩及廣彩為主。在十八世紀後半葉，以琺瑯顏料精心「作畫」進行裝飾的琺瑯彩繪瓷器在朝鮮王室中備受矚目。這一現象的背景，源自於朝鮮對近代化進程的渴望與追求。從這一立場出發，彩繪瓷器已然超越了奢侈品的範疇，轉變為一個國家自強不息、應對時代巨變所帶來混亂的最佳媒介。它們不僅是朝鮮跟隨時代潮流的象徵，更是展現其精幹形象與堅定決心的最佳手段。

關鍵詞：朝鮮、朝清交流、琺瑯彩繪瓷器、畫琺瑯、粉彩、廣彩

前言

在傳統觀念中，東亞各國在以中國為中心所形成的國際秩序中，共享政治、外交、經濟、文化、思想等多面向的資源。由於亞洲各國與西歐相比有更相近的地理優勢，且在東亞的大背景下，以佛教和儒教為中心形成了社會文化共同體意識。因此，當時清代瓷器在亞洲地區的廣泛傳播，便成為了合乎邏輯且理所當然的現象。在東亞國際秩序中，朝鮮作為與中國步調一致的國家，其對清代瓷器的接受與傳播情況，也呈現類似的趨勢。但在朝鮮，由

＊本文中所指的「琺瑯彩繪瓷器」不是一般意義上在清宮造辦處製作的畫琺瑯，而是指用琺瑯顏料裝飾的所有種類的彩瓷（瓷胎畫琺瑯、洋彩、粉彩、廣彩）。

＊＊（韓國）高麗大學文化遺產融合學部 助理教授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國家以儒家政治為基礎並崇尚節儉，① 所以在瓷器的使用方面，我們能感受到一些差異。例如，由於從中國進口的高價鈷料極為稀有，在朝鮮青花瓷成為了奢侈的象徵。因此，在朝鮮前期，青花瓷僅限於王室使用，並嚴禁私自購買或使用。② 這一傾向，透過古代漢城府內出土瓷器的情況得以印證。例如，在漢城府的中心地帶——即現在的鐘路區一帶，在清津8區的各個文化層中，共發現了約736件瓷器，其中無紋白瓷數量最多，達到485件，佔整體數量的66%。而青花瓷只有84件，約佔整體的11%。③ 儘管十八世紀後期朝鮮與清朝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清朝的文物以及北學論傳入朝鮮，但朝鮮青花瓷的使用狀況並未發生顯著變化。④ 在清津12-16區的考古發掘中，在十八至

① 《太祖實錄》15卷，太祖七年（1398）九月十二日，「上自庚辰齋戒，丙戌，備法駕詣太廟幄次。丁亥，上親祼以告即位訖，出於幄次，受群臣賀，駕還坐正殿，頒教旨：……（中略）……一，崇儉去奢，為治之本。宮中鹵簿、衣服、器皿，務從儉約，其有以奢侈為媚者，憲司罪之。……」收入《朝鮮王朝實錄》，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

② 《成宗實錄》77卷，成宗八年（1477）閏二月十日，……永濡曰：「今豪富之家，兢用青畫器，唐物非能自來，必有輸來之者。其弊不貲，請痛禁。」上曰：「勿貿唐物，曾已立法。其申明之。」收入《朝鮮王朝實錄》，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成宗實錄》77卷，成宗八年（1477）閏二月十三日，御經筵。講訖，大司憲金永濡啓曰：「青畫滋器已禁用，但大臣戚里好用之，本府禁亂吏，豈得發摘乎？請申飭禁止。」上謂左右曰：「何如？」領事韓明澮對曰：「大司憲之言是。申下旨禁之，則誰敢用之？」領事沈澮曰：「臣意謂使臣之還，時遣御史往察，則此弊自無矣」收入《朝鮮王朝實錄》，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燕山君日記》29卷，燕山四年（1498）六月十五日，「命議禮曹所啓禁制奢侈節目。……（中略）……第十六條油蜜果、金銀青畫白磁器、行果盤，《大典》已有禁令，司憲府申明痛禁。……」收入《朝鮮王朝實錄》，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

③ 한울문화재연구（HanU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종로청진 8지구유적 Ⅰ（*A Report on the Historic Site of Chungjin District 8 of JongnoI*）》（수원：한울문화재연구원，2013），頁249-251。

④ 김은경（Kim Eun-kyoung），〈조선후기 청 도자의 수용과 인식 변화（Changes of Perception and Acceptance of Qing Dynasty Porcelain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한국학연구（*Center for Korean Studies*）》，66集（2018.6），頁63-7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九世紀的第三文化層發現了161件瓷器，這些瓷器中無紋白瓷有117件，青花瓷僅有40件。⑤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對於無法製作釉上彩瓷器的朝鮮而言，明末期以後流行的五彩瓷器不僅比青花瓷更為稀有，還更加奢侈。從上述清津8區出土的736件瓷器中，五彩瓷器只有3件，可以推斷當時五彩瓷器的珍貴程度。因此，朝鮮孝宗（1649-1659）的長女—淑慎公主（1634-1645）墓中出土的兩件五彩瓷器，就顯得尤為引人注目。其中內壁底部有「大明萬曆年製」的款識，根據其風格樣式來看，可推測是明代末期的五彩瓷器（圖1）。從各個朝鮮時代考古遺址中出土的中國彩瓷現狀來看，十八世紀中期以後，彩瓷數量開始有所增加，然而相較青花瓷而言，其數量仍然相對較少。儘管如此，自清代以來，一種被稱為「法瑯」或「洋磁琺瑯」的新品種不斷傳入朝鮮，這一點值得我們關注。據十八世紀朝鮮文獻記載，清雍正帝和乾隆帝的賜品目錄中便包含了這一新品種，它可被歸類為清宮畫琺瑯的一種。這種新品種釉上彩瓷的製作顏料配方及技法在康熙年間透過歐洲傳教士引入中國，經過雍正和乾隆時期的發展，逐漸演變出了瓷胎畫琺瑯（／琺瑯彩瓷）、洋彩、粉彩、廣彩等多個品種。

那麼，傳入朝鮮的這一新品種彩瓷的種類是什麼呢？目前我們能夠掌握的線索主要源自文獻記錄，以及傳世與出土文物。文獻中提及的「法瑯」或「洋磁琺瑯」，極有可能指的是清宮所製作的瓷器胎畫琺瑯或銅胎畫琺瑯等畫琺瑯，這一點將在後續部分進行說明。對於其傳入朝鮮的實際面貌，可以透過十九世紀頒行的宮廷儀軌進行考察。在實物方面，有十九世紀末期朝鮮王室的傳世品，以及曾是王室一員的翁主墓、官廳及消費地遺蹟的考古出土品。其中，數量最多的是十九世紀末期景德鎮生產的民窯產品，這些產品大部分在填色之前需用「玻璃白」打底，即粉彩。這類實物資料，可以幫助我們根據其特徵來分辨種類。然而，文獻記錄在這方面卻很難明確區分品種種

⑤ 한울문화재연구（HanU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종로청진 12~16 지구유적 Ⅰ（*A Report on the Historic Site of Chungjin District 12-16 of JongnoI*）》（수원：한울문화재연구원，2013），頁10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類。儘管如此，從名稱的特徵和儀軌中出現的圖像來看，無疑與明代五彩不同。它可能是以新傳入琺瑯顏料進行彩繪裝飾的琺瑯彩繪瓷器。

傳入朝鮮的這一新品種的瓷器在朝鮮王室及貴族成員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廣泛使用。從朝鮮的文獻記錄和傳世品中，我們可以觀察到該瓷器傳入朝鮮後的具體消費情況。儘管該類彩繪瓷器數量還是不多，且學界對傳世品和消費情況的研究仍嫌不足，韓國及國際學界也長期忽視朝鮮的相關實例。然而，在十八至十九世紀世界陶瓷史中相對被忽視的朝鮮，卻於2017年在京畿道南楊州英祖（1724-1776）的第七女和協翁主（1733-1752）墓中發現了一件可推定為景德鎮民窯的粉彩瓷完整實物（圖2）。此一發現為重新檢視上述問題提供了契機。此外，近年來首爾市內鐘路的清津地區和毋嶽地區、中區東大門運動場遺址十九世紀文化層中出土的景德鎮粉彩標本也不在少數，這引起了我們的關注。根據朝鮮後期刊布的《朝鮮王朝儀軌》文獻記載和傳世品可知，琺瑯彩繪瓷器主要是由朝鮮王室和貴族使用。然而，首爾市內出土的文物大多位於王室居所以外的區域，這表明王室以外的人也使用了這種特殊瓷器。這一發現對我們深入了解當時中國傳入朝鮮的琺瑯彩繪瓷的使用情況和面貌，提供了更具體的分析材料。

在韓國學界，對韓國歷史上進口的清代陶瓷一直缺乏深入的研究。過去，韓國學界僅將這些陶瓷視為眾多進口到朝鮮的清代瓷器品類之一，對其進行基礎的訊息記錄。然而，1991年6月，在英祖的第十女和柔翁主（1740-1777）和及其丈夫「昌城尉黃仁點（1732-1802）」墓中，出土的一件清代粉彩瓶，標誌著清國傳入朝鮮琺瑯彩繪瓷器研究的起點。隨後，這件粉彩瓶在「和柔翁主墓出土品展」中展出，並進行了初步地調查（圖3）。儘管這次研究尚顯粗淺，但據推測，這件瓷器可能出自中國景德鎮，並在和柔翁主的丈夫黃仁點多次隨團出使清國後獲得。⑥ 在大韓帝國成立100週年之際，特別展「李花皇室生活遺物展」（1997）中，展示了大韓帝國（1897-1910）時期皇室所用的進口瓷器，其中包括了12件被推定為是粉彩和廣彩的瓷器。然而，由於當時對琺瑯彩繪瓷器的研究還尚不充分，這些瓷器暫時以「彩瓷」的稱

⑥ 궁중유물전시관（The Royal Museum），《기증유물도록（*Special Exhibition on the Donated Collection*）》（서울：궁중유물전시관，1997），頁5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謂替代了其確切的名稱。鑒於其製作年代和生產國尚未明確，專家們開始致力於查明這些瓷器真實背景和來源的研究。⑦ 儘管存在將部分出土品誤認為是日本產品以及錯誤判斷製作年代的情況，但全面展示傳入朝鮮的十九世紀清代的琺瑯彩繪瓷器的實物無疑為相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框架，具有深遠的學術意義。

自出土品被公開後，進入二十一世紀，朝鮮和清朝的陶瓷貿易與交流逐漸成為學界的焦點，吸引了部分研究者開展專項研究。方炳善便是這一領域的代表，他率先對傳入朝鮮的清代進口瓷器中的琺瑯彩繪瓷器進行了深入研究。從二十一世紀初期開始，他透過一系列的研究論證了《朝鮮王朝儀軌》和《冊架文房圖》中所描繪的部分中國瓷器是清代的「琺瑯彩繪彩瓷」，進一步證實了朝鮮後期社會所消費的清代瓷器形態之豐富多樣。⑧ 特別是他發表的關於廣彩的專項研究，為韓國學界這一相對陌生的琺瑯彩繪彩瓷研究領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⑨ 筆者亦欲透過對比十九世紀朝鮮末期的民畫《冊架圖》中出現的各類琺瑯彩繪瓷器與實際的傳世品，試圖釐清其真正面貌。⑩

---

⑦ 궁중유물전시관（The Royal Museum），《오얏꽃 황실생활유물（*Oyat Flower (White Plum Flower), The Imperial Household Relics*）》（서울：궁중유물전시관，1997），頁98-111。

⑧ 방병선（Bang Byung-sun），〈17-18세기 동아시아 도자교류사 연구（Mutual Interactions in Ceramics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17th-18th Centuries）〉，《미술사학연구（*Korean Journal of Art History*）》，232號（2001.12），頁131-155；방병선（Bang Byung-sun），〈이형록의 책가문방도 팔곡병에 나타난 중국도자（Chinese Ceramics Shown on the Yi Hyungrok (1808-1863?)'s Eight-folded Screen of Painting: Scholar's Items and Books and Bookshelves (Chaekgamoonbangdo)）〉，《강좌미술사（*The Art History Journal*）》，28號（2007.1），頁209-238。

⑨ 방병선（Bang Byung-sun），〈청대 중서（中西） 도자 교류의 표상, 광채（廣彩）（A Study of Guangcai: Symbol of Cultural Exchange of China and Europe in the Qing Dynasty (1636-1912)）〉，《한국근현대미술사학（*Journal of Korean Modern & Contemporary Art History*）》，29集（2015.7），頁33-61。

⑩ 김은경（Kim Eun-kyoung），〈책거리에 등장하는 중국 도자의 함의 – 장한종, 이형록의 책거리를 중심으로（The Meaning of Chinese Porcelain in Chaekgeori Painting - Chaekgeori Paintings of Jang Han-jong and Yi Hyeong-rok）〉，《조선 선비의 서재에서 현대인의 서재로（*Special Exhibition on Chaekgeori Screen Paintings: History of Studies from the Joseon Dynasty to Modern Times*）》（경기도：경기도박물관，2012），頁188-203。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外，基於「李花皇室生活遺物展」的資料，筆者探討了從朝鮮末期到大韓帝國時期王室所使用的清代釉上彩瓷器，並嘗試根據樣式特徵將統稱為「彩瓷」的釉上彩瓷器細分為粉彩、廣彩等類別。⑪

本研究將基於韓國學界迄今為止的研究成果，以及筆者在清代彩瓷傳入朝鮮領域的研究經驗，進一步探討十八至十九世紀間傳入朝鮮的清代琺瑯彩繪瓷器在朝鮮的使用情況和種類，以及這些瓷器對朝鮮白瓷產生的影響。儘管目前可查的文獻資料較為有限，傳世品與出土品的數量也相對較少，但不可忽視的一個事實是，朝鮮王室在摒棄華麗裝飾的同時，使用了清朝彩瓷。若能揭示朝鮮是如何認知並接納清朝彩瓷的，我們有望填補世界陶瓷史中關於朝鮮陶瓷文化未被充分關注的空白。

一、朝鮮後期文獻紀錄中的清代琺瑯彩繪瓷器

十八世紀，清代琺瑯彩繪工藝品首度傳入朝鮮，這一史實能夠在清朝文獻中得以確認。⑫ 具體而言，雍正元年（1723），即朝鮮景宗三年，朝鮮為祝賀雍正帝即位派遣使節團，作為答謝，雍正帝賜予朝鮮各種物品，這一事件在相關文獻中有所記載。文獻中，關於雍正元年雍正帝賜予朝鮮國王的物品記錄有2份，分別是《雍正元年御筆賞賜簿》⑬ 和《同文彙考》。⑭ 後者

⑪ 김은경（Kim Eun-kyoung），〈19세기 조선왕실 소용 청대 유상채 자기 연구（A Study on Qing Porcelain with Overglaze Decoration Used by the Joseon Royal Family in the 19th Century）〉，《강좌미술사（*The Art History Journal*）》，46號（2016.1），頁135-163。

⑫ 本文使用的「琺瑯彩瓷」是廣義的，指中國清代使用琺瑯顏料繪製後、經二次燒成的瓷器作品。相關名詞用法的討論請見廖寶秀，〈乾隆磁胎洋彩綜述〉，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華麗彩瓷：乾隆洋彩》（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10-15；施靜菲、彭盈真，〈從文化脈絡探討清代釉上彩名詞琺瑯彩、洋彩與粉彩〉，《故宮學術季刊》，第29卷第4期（2012年夏季號），頁1-74。

⑬（清）《雍正元年御筆賞賜簿》，七月十五日，「賞朝鮮國王毫筆二匣一百六十枝，淵鑒齋墨四匣二十四錠，貢墨四匣十六錠，嵌玻璃石盒綠石蚌丁池硯一方，嵌玻璃黃石盒綠石蒼龍硯一方。」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王澈編選，〈雍正元年御筆賞賜簿〉，《歷史檔案》，2001年3期，頁20。

⑭（清）承文院，《同文彙考》一，卷之三十七，「錫賚」，雍正元年（1723）七月二十一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朝鮮後期與清朝往來的外交文書匯編，其中包含了清朝禮部的咨文。如果我們將這兩份記錄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發現《雍正元年御筆賞賜簿》（以下簡稱《賞賜簿》）於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撰寫，《同文彙考》則於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完成。兩者在賞賜品目上也有所不同，前者簡單出了幾個品類，而後者則更為詳細，包括了賞賜品目、數量、傳達機關（禮部）以及接受使節（密昌君李樴）和接受空間[午門]等信息。據此推測，雍正帝可能於七月十五日首次下達向朝鮮國王賜物的旨意，6日後，經過某些過程，雍正帝在首次賜予的品類中追加了御纂周易、御纂朱子、御製法瑯，西洋問鐘等物品，並由禮部傳達給朝鮮。根據禮部的咨文，「御製法瑯碗十箇，御製法瑯蓋碗一對，御製法瑯茶碗四箇，御製法瑯水壺一把」和「西洋法瑯問鐘一箇」等大約18件琺瑯器首次傳入朝鮮。其中，「西洋法瑯問鐘」採用當時西方的琺瑯技術，以金屬製成，並具備手錶的特性。透過現存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西洋鐘錶進行分析，可以確定其為銅胎畫琺瑯的種類。然而，僅憑現有記錄，尚無法準確判斷此時傳入的琺瑯器是瓷胎、玻璃胎、銅胎、宜興胎中的哪一種。若是瓷器材質的話，品名中應當包含「磁器」二字。同時，雍正元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中，也有關於「琺瑯紅磁鍾大小十六件」的記錄，明確表明其為瓷器製作的琺瑯器。⑮ 此外，透過第二年即雍正二年（1724），下賜給暹羅和琉球的品目中「法瑯器」的名稱也可以進行推測。記錄顯示，暹羅於雍正二年十月左右得到賞賜品「各色緞

日，「癸卯，禮部知會賀登極時賜物諮互進賀：禮部為知會事主客清吏司案呈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上賜朝鮮國王姓某御纂周易折中全部，御纂朱子全書全部，御製法瑯碗十箇，御製法瑯蓋碗一對，御製法瑯茶碗四箇，御製法瑯水壺一把，嵌玻璃紫石夔龍盒珠池綠端硯一方，嵌玻璃黃石盒綠端硯一方，貢墨八匣湖筆二匣，西洋玻璃罩時辰問鐘一坐，西洋法瑯問鐘一箇，西洋表一箇，於本日在午門前交與正使密昌君李樴一跪領訖相應知會該國王祇承可也，為此合諮前去云云，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收入디지털장서각（Digital Jangseogak藏書閣），https://jsg.aks.ac.kr/dir/view?dataId=JSG_K2-3474.

⑮（清）《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琺琅作」，雍正元年（1723）二月二十三日，「郎中保德交法瑯紅磁鍾大小十六件，奉怡親王諭：著暫且放著。遵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1，頁19。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十，松花石硯，玉器，瓷器，琺瑯器」；⑯ 琉球也在同年得到賞賜品「磁胎燒金法瑯有蓋靶碗」6個。⑰ 此外，作為邊疆政策的一環，還向西藏達賴喇嘛賞賜了「磁胎琺瑯茶碗一件（雍正三年，1725）」。⑱ 這些記錄中的「磁胎燒金法瑯有蓋靶碗」或「磁胎琺瑯茶碗」均明確指出了瓷器的材質。關於暹羅的情況，另有明確的「瓷器」名示，因此，咨文中出現的琺瑯器並不一定是瓷器質地。⑲ 因此，目前尚難以判斷首次傳入朝鮮的「御製法瑯」是清宮畫琺瑯中哪一種材質製成，瓷胎、金屬胎、玻璃胎，還是宜興胎？但透過該記錄可以確認，雍正元年是清宮「畫琺瑯」技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完善的時期。朝鮮幾乎無時差地接觸到了清皇室的最高級工藝品，這一點非常值得關注。

---

⑯（清）梁廷枏編，《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2013），〈粵道貢國說〉，卷二・暹羅國二，雍正二年（1724）十月二十八日，「又，議準：暹羅國入貢，照康熙六十一年加賜之例，船長照通事例，番梢照從人例，加賞緞、羅、絹、布有差。其船長雖非貢使可比，但載運米糧，向化遠來，於原賞布十疋外，再各加賞十疋，又特賜國王各色緞二十、松花石硯、玉器、瓷器、琺瑯器等物，差司官齎賞物，一並送至廣東交與該撫，付船長領回。」

⑰（清）周煌編，《琉球國志略》，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152991，卷三，〈封貢〉，雍正二年（1724），「……二年，世宗憲皇帝召見王舅翁國柱於乾清宮，御書匾額「輯瑞球陽」四字賜王，及玉、緞等物交與翁國柱賫回；仍賞國柱銀，幣《法瑯爐瓶盒一分，白玉盒一對，漢玉玦一件，白玉鎮紙二件，三喜玉杯一件，青玉爐一件，白玉提樑礶一件，漢玉螭虎筆洗一件，青玉三喜花插一件，白玻璃大碗四，白玻璃蓋碗六，磁胎燒金法瑯有蓋靶碗六，青花白地龍鳳蓋碗十二，青花白地龍鳳蓋鍾十，藍磁盤十二，霽紅碟十二，霽紅碗十，填白八寸盤十二，綠龍六寸盤二十，青花如意五寸盤二十，青團龍大碗十二，五彩宮碗十四，綠地紫雲茶碗十，紫檀木盒綠端硯一方，棕根盒綠端硯一方，上用緞二十匹。賞王舅翁國柱銀一百兩，上用緞八匹》，恤病故官生蔡宏訓銀三百兩《留一百兩修理墳墓；其二百兩著翁國柱帶回，交宏訓之母養贍》。王遣毛健元，蔡淵入貢。」相關研究參考，見謝明良，〈關於金琺瑯靶碗〉，《故宮文物月刊》，372期（2014），頁80-90。

⑱（清）《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雍正三年（1725）八月二十五日，「……賞達賴喇嘛，頭號磁胎琺瑯茶碗一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頁429。

⑲ 相關研究，許曉東認為瓷胎或銅胎沒有區分，都為畫琺瑯。許曉東，〈康熙、雍正時期宮廷與地方畫琺瑯技術的互動〉，收入故宮博物院、柏林馬普學會科學史所編，《宮廷與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技術交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31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那麼，關於琺瑯彩繪瓷器傳入朝鮮的具體時間，我們仍需進一步探討。琺瑯彩繪瓷器涵蓋瓷胎畫琺瑯、洋彩、粉彩、廣彩等類別。那麼，究竟是何種類別的琺瑯彩繪瓷器傳入朝鮮了呢？在畫琺瑯的範疇內，包括了清宮造辦處琺瑯作所生產的瓷胎畫琺瑯，⑳ 和景德鎮御窯廠所製的洋彩。據唐英（1682-1756）所述，洋彩在繪畫技法上模仿了西方琺瑯，且使用的顏料也與琺瑯料相同。㉑ 有時，粉彩與洋彩會在學術討論中被相提並論。儘管粉彩與洋彩在上色方法和顏料等方面存在差異，但今天有些學者習慣上仍將粉彩視為洋彩的一種。㉒ 儘管筆者認同這一學界觀點，但仍認為粉彩與洋彩在某些方面存在區別。粉彩這一名稱最早出現於清末光緒時期（1874-1908）編纂的《匋雅》。㉓ 作者寂園叟指出「康熙彩硬，雍正彩軟，軟彩者，粉彩也。」此外，作者還提到「粉彩云者，不專指紅色而言，黃綠茄紫亦皆有粉也」，粉彩的顏色特徵在於是否使用了表現粉彩瓷器的「粉」的「玻璃白」。值得注意的是，粉彩這一名稱在官用瓷器生產中並不常見，但在清末民間卻廣泛使用。這可能是因為民間所見到的「軟彩者，粉彩也」是先塗玻璃白，再在上面塗上琺瑯料或五彩料，呈現出柔和色調的景德鎮民窯產品。㉔ 因此，粉

⑳ 王健華，〈清代宮廷琺瑯彩綜述〉，《故宮博物院院刊》，1993年3期，頁52。

㉑ （清）唐英，《陶冶圖說》，〈圓琢洋彩〉條，「圓琢白器，五采繪畫，摹仿西洋，故曰洋采，須選素習繪事高手，將各種顏料研細調和，以白瓷片畫染燒試，必熟諳顏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細，熟中生巧，總以眼明心細，手准為佳，所用顏料與法瑯色同，其調色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膠水，一用清水，蓋油色便於渲染，膠水所調便於搯抹，而清水之色便於堆填也，畫時有就案者，有手持者，亦有眠側於低處者，各因器之大小以就運筆之便。」收入張發穎編，《唐英督陶文檔》（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頁10。

㉒ 汪慶正，〈“粉彩”即“洋彩”考〉，《上海博物館集刊》，1期（1981），頁92-94。

㉓ （清）陳瀏（寂園叟），《匋雅》，卷上〈匋雅一〉，「康熙彩硬，雍正彩軟，軟彩者，粉彩也，彩之有粉者，紅為淡紅，綠為淡綠，故曰軟也，惟藍黃亦然。」收入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編，《中國古代陶瓷文獻輯錄-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15），頁170。

㉔ 周覺民曾提出過將粉彩視為民窯產的見解。他認為，粉彩和洋彩都是景德鎮製作的琺瑯瓷器，但卻是各不相同的品類，現在粉彩的名稱代替了過去洋彩的名稱並被廣泛使用。另外，雖然在過去的窯廠中使用了洋彩這一名稱，但並未使用粉彩的名稱，因此判斷粉彩是從洋彩中分離出來的。筆者也同意這一意見。周覺民，〈官窯“洋彩”與民窯“粉彩”〉，《陶瓷學報》，第24卷第3期（2003），頁179。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彩也和洋彩一樣，繼承了西方畫琺瑯的繪畫技法，並在顏料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共享，可以將兩者置於畫琺瑯的討論範疇內。但嚴格來說，粉彩是否應被視為從景德鎮官窯產洋彩派生出來的民窯產品？基於上述觀點，我們不禁要問，在朝鮮時代的文獻記錄和圖說中，所提及的清朝琺瑯彩繪瓷器的具體類型究竟是什麼呢？

透過對朝鮮時代文獻的深入考察，我們觀察到與傳統意義上代表中國瓷器的術語如「唐畫器」、「唐沙器」、「唐磁器」、「畫磁器」、「畫器」及「畫彩」等相比，新興詞彙「洋磁琺瑯」㉕ 和「洋磁」㉖ 明顯呈現出獨特的差異。十八世紀琺瑯彩瓷的正式傳入是在正祖十年（1786，即乾隆五十一年）、㉗ 正祖十一年（1787，乾隆五十二年）㉘ 及正祖十四年（1790，即乾

㉕《日省錄》，正祖十年（1786）二月二十八日，「通官來言，皇上以為，緞匹則每年例有所送，在該國未必為奇，故將以文房器玩，別有所送，係是特恩，而當自軍機房，親授於臣等云，午後，臣等入山高水長閣，通官引臣等詣軍機朝房，禮部侍郎達春出立，以黃盤盛玉如意一柄，玉器二件，磁器四件，玻璃器四件，硯二方，絹箋大小各二卷，筆二匣，墨二匣，洋磁琺瑯盒四件，雕漆盤四件，授臣等曰，此是皇上自內親揀，特送於國王云，故臣等祇受，仍入班次，諸般燈戲，擧皆整待，適因風勢大作，有旨停戲。」收入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

㉖ 李德懋編，《青莊館全書》（1795），卷之六十七，〈入燕記（下）〉，正祖二年（1778）五月二十一日，「二十一日庚辰，熱，留館……又買假花四盆，菊二，月桂二，盆則洋磁，圍以琉璃，冬日見之，鮮鮮如活花……」收入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

㉗ 李德懋編，《青莊館全書》（1795），卷之六十七，〈入燕記（下）〉，正祖二年（1778）五月二十一日。

㉘《日省錄》，正祖十一年（1787）正月二十三日，「……十二月初四日，歲幣方物，無弊呈納，十九日臣等詣午門前，依例領賞，照例折賞，玲瓏鞍具為一匹，貂皮一百張，各色緞紬五十四疋，謹為領受，又於二十六日，自軍機所，奉上諭加賞，如意一柄，玉器三件，磁器四件，玻璃器四件，硯二方，絹箋四十張，筆二匣，墨二匣，洋磁琺瑯盒四件，雕漆器四件，亦為祇受，當日加賞臣等，八絲緞各一疋，絹箋各二卷，筆墨各一匣，本年正月初一日……」收入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隆五十五年），㉙ 這些瓷器均為乾隆皇帝所賜，分三次傳入，總計約10件。洋磁與琺瑯的結合顯然與清宮的畫琺瑯工藝品有關，然而，上述記錄是否專指瓷器材質，仍需進一步的研究。在民國時期的文獻《飲流齋說瓷》中，洋瓷被定義為「銅胎掛瓷之品」，這反映出當時人們對其稱呼為「洋瓷」的情況。㉚ 此外，在清宮著名之〈集瓊藻〉百什件內附藏品清冊中出現了「洋磁荷葉筆掭」的稱謂，比對實物為銅胎畫琺瑯，這表明在乾隆時期的某段時間內或某些脈絡中，銅胎畫琺瑯被歸類為洋磁。㉛ 同時期的「各色磁器八十八件，內有洋瓷三十八件」記錄也顯示，洋磁（瓷）也意味「磁器」。㉜ 因此，在清代，洋瓷這一稱謂實際上是金屬與瓷器混用的名稱。

那麼，在朝鮮文獻記錄中，「洋磁」又是如何被使用的呢？鑒於這一術語在朝鮮本土並不常見，其特性難以直接查明。不過，在朝鮮後期實學家洪大容（1731-1783）所編纂的燕行記中，他描述了在清朝所見的西洋瓷器，「西洋磁器。內為銅器。外塗以磁。華而牢。磁之巧品也。」這似乎是對銅

㉙（清）承文院，《同文彙考》四，「錫賚」，乾隆五十五年（1790）正月，「庚戌，禮部知會進年貢時，加賞賜物咨互節使：禮部為知照事主客司案呈查，朝鮮國進貢幷慶賀萬壽遣使來京，除照例賞賜外，所有格外賞賜國王之處，相應開單知照，朝鮮國王可也云云，計開正月十三日，圓明園山高水長加賞國王，御筆福字一箇，白玉如意一柄，白玉香爐一件，白玉筆洗一件，琥珀碟一對，琺瑯瓶一對，藍淡瓶一對，洋磁盒一對，紅漆茶盤四箇，端硯二方，筆三匣，墨三匣，花箋四卷，福字花箋一百張，乾隆五十五年正月日……」收入디지털장서각（Digital Jangseogak藏書閣），https://jsg.aks.ac.kr/dir/view?dataId=JSG_K2-3474.

㉚（民國）許之衡編，《飲流齋說瓷》，〈說彩色第四〉，「洋瓷，洋瓷有兩種，一為泰西流入之洋瓷，本不入考古家賞鑑，然清初流入之品，有極精者如繪女神像，自由神之屬，懭詭可喜，至舊至精者，亦堪藏度一二也，一為吾國所造銅胎掛瓷之品，市人通稱亦曰洋瓷，實則此類彩繪，大半本國華風，尤以繪西廂等故事為多其，兼仿洋彩者，反居少數則呼曰洋瓷，稱名殊嫌不當，大抵互市伊始，洋瓷流入流入，有銅胎者遂印市人之腦，由是凡瓷之銅胎者，不問其為本國製與否，概以洋瓷呼之，相沿成習，牢不可破耳。」收入許之衡著，杜斌編，《飲流齋說瓷》（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907。

㉛ 余佩瑾，〈清宮傳世「仿洋瓷瓶」及相關問題〉，《故宮文物月刊》，410期（2017.5），頁80-81。

㉜ 余佩瑾，〈清宮傳世「仿洋瓷瓶」及相關問題〉，頁8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胎畫琺瑯的描述。㉝ 然而，在正祖十一年（1787）的賜品清單中，「磁器四件」與「洋磁琺瑯盒四件」同時出現，這表明至少在當時，兩者被視為不同的品種。自朝鮮建國以來（1392年），「磁器」一直作為正式表示陶瓷的漢字被使用。在清朝，諸如「磁胎畫琺瑯」或「磁胎洋彩」等名稱也明確指出了瓷器的特性。因此，在朝鮮對「磁器」即為陶瓷有明確認識的情況下，他們很可能也認識到洋磁琺瑯與白瓷或青瓷有所不同，是一種採用西方畫法和技法製作的瓷器。這並不能完全排除乾隆皇帝賜贈洋彩瓷器的可能性。

在同一時期，朝鮮工藝品中受到琺瑯彩影響而生產的，僅限於朝鮮白瓷，且受影響最為顯著的是同樣材質的琺瑯彩繪瓷器。例如，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年間的〈玻璃胎畫琺瑯黃地福壽八楞瓶〉這一玻璃胎畫琺瑯八楞瓶，在十九世紀被朝鮮白瓷所模仿生產，這構成了朝鮮白瓷模仿其他材質琺瑯器物的罕見實例（圖4、5）。此外，朝鮮文獻中所提及的「洋磁琺瑯」，由於缺乏傳世實物，雖難以確切證實當時賜予的洋磁即為磁胎洋彩。然而，根據推測，十九世紀初期在朝鮮王朝禮儀中出現的清代琺瑯彩繪瓷器，很可能與當時透過清宮賜予的洋彩瓷器存在關聯。

進一步而言，正祖十年（1786）期間，朝鮮接受「洋磁琺瑯盒」的賜予背景同樣引人關注。乾隆帝選擇將常規賞賜的綢緞替換為較為特殊的洋磁琺瑯，其言及「在該國未必為奇，故將以為文房器玩」，並特別使用了「特恩」一詞。清朝皇帝此等考量可能基於對當時朝鮮國內尚未擁有此類琺瑯器皿及文房玩具的認識，認為這些物品是僅能透過清朝獲得的珍貴之物。實際上，「洋磁」指的是在景德鎮御窯廠特製的御用瓷器，即便是朝鮮國王亦無法私自獲取，而必須透過清宮的官方途徑進行接觸。因此，在正祖十年之前的文獻記錄中，未曾發現指代「琺瑯彩瓷」的名稱，表明此前該物品尚未透過清朝官方正式傳入。正祖十四年（1790），朝鮮亦接受了乾隆帝賜予的「琺瑯瓶一對」，與其他賜予品相異，未明確標示器物材質，推測可能為琺

㉝ 洪大容編，《湛軒書》，〈燕記〉，〈器用〉「琉璃廠及通州市。磁器寶翫珍怪。充溢其數。尺壺樽。彩虹色。兩耳雕螭龍。貫大金環。異光奪目。其西洋磁器。內為銅器。外塗以磁。華而牢。磁之巧品也。」收入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瑯作所製的瓷胎、金屬胎、玻璃胎或宜興胎之一。進入十九世紀，儘管與清朝琺瑯彩瓷器相關的多種名稱，如琺瑯瓷、洋彩、粉彩、廣彩等，並未在當時出現。然而，在十九世紀所製的朝鮮官窯青花瓷中，模仿清代官方琺瑯器特徵的事例頗為常見。其背景可能與十九世紀朝鮮王室儀式中出現的、被推測為清代琺瑯彩瓷器的器物有關。具體來看，在十九世紀的儀式記錄中，如《戊子進爵儀軌》（純祖二十八年，1828）、《戊申進饌儀軌》（憲宗十四年，1848）、《戊辰進饌儀軌》（高宗二年，1868）、《丁丑進饌儀軌》（高宗十四年，1877）、《丁亥進饌儀軌》（高宗二十四年，1887）、《壬辰進饌儀軌》（高宗二十九年，1892），以及二十世紀初的《辛丑進饌儀軌》（光武五年，1901），均發現了疑似清代琺瑯彩瓷器的器物（表1）。從儀式圖示中可以觀察到，這些瓶子的形態與紋樣裝飾並非朝鮮官窯所生產，且可能為同一器物，從十九世紀初期至二十世紀初期一直被重複使用。這些器物在純祖年間（1801-1834）新創制的宮廷舞蹈（宮中呈才）及禮儀裝飾中作為道具使用，專用於特定的禮儀場合。因此，這些瓶子的名稱並非其原始名稱，如花樽、牡丹花樽等，而是根據其在宴會中的用途所賦予的名稱。

透過細緻的圖示分析，我們發現1848年的《戊申進饌儀軌》中所描繪的牡丹花樽，在造型與裝飾風格上與東京國立博物館所收藏的帶有「大清乾隆年製」款的〈粉彩透雕唐草紋雙耳瓶〉極為相似（圖6、7）。鑒於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之瓶具有官方窯廠的款識，這表明其極有可能是景德鎮御窯廠所生產的官窯瓷器。《戊申進饌儀軌》中的牡丹花樽，在樣式上與之高度一致，這表明它同樣可能是在乾隆年間由御窯廠生產，並經過一定的流轉過程最終傳入朝鮮王室。因此，該牡丹花樽有可能就是乾隆帝賜予朝鮮的「洋磁」或「琺瑯瓶」。儘管東京國立博物館將此瓶命名為「粉彩」，但根據歷史文獻，御窯廠生產的清宮琺瑯瓷器通常被稱作洋彩。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講，該瓶亦應被歸類為乾隆年間生產的洋彩瓷器。此外，結合民國時期清宮收藏的磁胎洋彩瓷器被改稱為「粉彩」的記錄，[34] 可以推測〈粉彩透雕唐草紋雙耳瓶〉的命名乃是沿襲了這一習慣性稱謂。據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斷，

[34] 廖寶秀，〈乾隆磁胎洋彩綜述〉，頁1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戊申進饌儀軌》中所描繪的牡丹花樽，其樣式與乾隆年間生產的洋彩瓷器極為相近，且很可能是由乾隆帝賜予朝鮮國王的珍貴禮物。

1848年《戊申進饌儀軌》中裝飾空間的花瓶—「花樽」還展現出了朝鮮後期青花瓷中看不到的器形和紋樣（圖8）。花樽造型細長，從頸部開始依次裝飾著蝙蝠紋、雙喜紋、花枝以X形對稱延伸的蓮花紋，以及花卉地紋，是清朝生產的琺瑯彩繪瓷器中的一種。雖然很難確定這件花樽是何時何地生產的，但紋樣的組合與道光年間（1821-1850）御窯廠生產的洋彩幾乎相似。雖然與儀軌中出現的器形不同，但湖北省博物館收藏的「大清道光年製」款〈粉彩寶相花雙喜大碗〉和個人收藏〈粉彩松綠地番蓮雙喜茶壺〉上看到的蝙蝠紋、雙喜紋、花枝以X形對稱延伸蓮花紋等紋樣的組合，是在這個儀軌的花樽上也能看到的，由此可以看出這個花樽是在同一時期生產的（圖9、10）。只是因為實物沒有流傳下來，所以不知道是否存在官窯款識。另外，在朝鮮王室與清朝的文獻記錄中也不存在道光年間透過清皇室得到下賜或贈予的記錄，所以並不能斷定這件花樽就是御窯廠所生產的洋彩。雖然朝鮮王室透過其他途徑得到的民窯產粉彩的可能性也很充分，但即使是民窯產品，也不能否認清朝的琺瑯彩繪瓷器在朝鮮王室中被認為是相當重要的工藝品。

進一步觀察可見，「獻天花瓶」自純祖二十八年（1828）《戊子進爵儀軌》中首次出現後，一度消失無蹤，隨後在高宗二十四年（1887）的《丁亥進饌儀軌》及高宗二十九年（1892）的《壬辰進饌儀軌》中再度出現（圖11）。該花瓶頸部修長，肩部裝飾有類似包袱的紋樣，此裝飾風格被稱為包袱紋，自雍正年間（1723-1735）首次製作，經過乾隆年間（1736-1795），至嘉慶年間（1796-1820）廣為流行。㉟ 此外，「沉香花瓶」作為宮廷舞蹈《沉香春舞》中的道具，其瓶身下部貼有蟠螭紋樣，此種裝飾手法被稱為「貼蟠螭紋」（圖12）。在琺瑯彩繪瓷器的傳世品中，瓶身以包袱紋環繞並採用貼花技法進行裝飾的例子是可以得到確認的，且在同一場王室活動中使用不同樣式的琺瑯彩繪瓷器亦是常見之事。筆者曾對這兩件花瓶是否為琺瑯彩繪瓷器提出疑問。然而，考慮到儀式中出現的各類器物均描繪得極為精細，尤其

㉟ 馮明珠等，《嘉慶君・遊臺灣—清仁宗文物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30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前述兩件琺瑯彩繪瓷器的裝飾細節均被細緻刻畫，鑒於此，由於這件花瓶並未展現紋樣，它同樣有可能是單色釉瓷器。

根據純祖二十八年（1828）及高宗二十九年（1892）的儀軌記錄，我們可以確認花樽與牡丹花樽在樣式上是一致的，並且從首次出現至記錄時已傳承並使用了大約六十年。此外，在《壬辰進饌儀軌》（1892年）的第四卷中，有關於樂器和樂歌舞中使用物品的種類和價格的記錄，其中在「樂器風物」條目下記載了「唐彩花樽四坐內下」。㊱ 據此，我們可以了解到，在宴會上使用了牡丹花樽一件、獻天花瓶一件、沉香花瓶兩件，共計4個花樽，這些均為當時從清朝傳入的彩繪瓷器。此外，「內下」指的是由國王親自下撥，意味著這些「唐彩」瓷器是由國王直接掌管的。與十八世紀不同，十九世紀的記錄中並未出現「琺瑯」、「琺瑯洋磁」等具體名稱。從歷史背景來看，十八世紀後期，被認為是洋彩或粉彩的琺瑯彩瓷器已經透過清皇室傳入朝鮮，不再被視為新奇之物。這些瓷器可能經過長時間的傳承，並在特定的儀軌中被反覆使用，從而被納入了唐沙器或唐花器的範疇。同樣地，它們也可能像「唐彩花樽」一樣，根據使用場合和用途進行了相應的記錄。

二、傳入朝鮮的清代琺瑯彩繪瓷器特徵及其傳入途徑

透過細緻考察十八至十九世紀朝鮮後期社會中所使用的琺瑯彩繪瓷器之特徵與消費情況，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測朝鮮對清代彩瓷的認知水平，這一認知對於理解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在朝鮮宮廷內，關於琺瑯彩繪瓷器的使用記錄及傳世品均極為豐富。正如前文所述，琺瑯彩繪瓷器的傳入與使用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均得到了確證。儘管十八世紀並未有實物流傳至今，但根據文獻記載，作為清朝皇帝賜予的禮品，推測為官窯洋彩的

㊱《壬辰進饌儀軌》，第4卷（卷之三），高宗二十九年（1829），「樂器風物」，「樂器風物附呈才儀物，樂院新造及修補特鍾一枝，新造都給錢九百八十兩，架子一坐，新造都給錢九百五十兩，以上折錢一千九百三十兩……樽花二雙所入，樽花四朵貿用，唐彩花樽四坐內下，維結次紅絲，三甲所二艮衣尚方，絨紅藍水紬各四疋本所……」收入（Digital Jangseogak藏書閣），https://jsg.aks.ac.kr/dir/view?dataId=JSG_K2-2880.

臺大醫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琺瑯彩繪瓷器已經傳入朝鮮。進入十九世紀，透過儀軌記錄可見，類似洋彩或粉彩品類的琺瑯彩繪瓷器曾被用作王室宴會中舞蹈——宮中呈才的道具。這引發了關於現存實物的傳世品或出土案例是否與文獻記載相符，以及這些瓷器是透過何種途徑傳入朝鮮的問題。如前文所述，十八世紀賜予正祖的「洋磁琺瑯」作為乾隆帝親自賞賜的物品傳入朝鮮，這一傳入途徑非常明確。關於十九世紀儀軌中出現的琺瑯彩繪瓷器，1848年《戊申進饌儀軌》中所記錄的「牡丹花樽」在樣式上與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粉彩松綠地番蓮雙喜茶壺〉相似，極有可能是乾隆年間生產的洋彩瓷器。因此，可以推測「牡丹花樽」也是透過清朝賜予朝鮮後，一直使用至十九世紀。然而，儘管不是在同一活動中使用的花樽或其他彩瓷，但如獻天花瓶和沉香花瓶等明確是從清朝傳入的瓷器，它們是官窯還是民窯產品這一點尚不明確，因此其具體傳入途徑也不得而知。

事實上，自1392年朝鮮王朝建國以來，透過明、清朝廷賜予朝鮮的瓷器記錄較為稀少。以《朝鮮王朝實錄》為參考，在世宗年間（1419-1450），除了明宣德帝數次親自賜予朝鮮國王世宗的大量白瓷和青花瓷之外，[37] 直至明朝末年，未見有明朝皇室正式賜予朝鮮王室的瓷器記錄。清朝建國之後，如前文所述，亦僅有幾次向朝鮮王室贈送瓷器的記錄。特別是透過正祖十年（1786）的賜贈情況，我們可以了解到，瓷器通常是在特殊情況下作為「特恩」賜予的。而朝鮮使節團訪問清國時，通常獲得的賞賜物品為絲綢、皮革等。[38] 因此，可以推測皇帝直接賜予的瓷器很可能是御窯廠生產的官窯產品，而民間產品則透過其他流通渠道進入朝鮮。鑒於青花瓷在倡導節儉的朝

[37] 《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十年（1428）七月十九日，「上率王世子及百官，迎勅于慕華樓，至景福宮行禮如儀。勅曰：今賜王白素磁器十卓、白磁靑花大盤五箇、小盤五箇，至可領也。」收入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

[38] 《日省錄》，正祖十四年（1790）二月二十日，「正官等頒賞例於發行前數日頒給而內務府奉旨緞疋則先為頒給貂皮銀子馬匹則發行時午門外頒給云故回送禮單與臣等正官三十人賞賜中緞疋先為領受。」收入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鮮王室中也被視為奢侈品，㊴ 民間生產的琺瑯彩瓷器是如何傳入朝鮮的，具體途徑尚需進一步的考察與研究。

首先，十八世紀的琺瑯彩繪瓷器在朝鮮半島的出土實例極為罕見，目前僅見於英祖（1725-1776）的第七女和協翁主（1733-1752）以及第十女和柔翁主（卒於1777年）的墓葬中出土的兩件。這兩例墓葬出土的琺瑯彩繪瓷器是迄今為止在韓半島發現的最早的清代琺瑯彩繪瓷器實證。和協翁主卒於1752年，其墓葬在1776年進行了遷移。㊵ 2016年11月，在韓國京畿道南楊州發現的和協翁主墓並未發現遺骸，而目前所知，位於京畿道南楊州市平區村的和協翁主夫婦合葬墓，據推測為遷移前的原葬地。對已公開的和協翁主墓中出土瓷器進行特徵分析，可見其器壁較厚，以粉紅色為底色，使用玻璃白進行初步施釉後，再以較為粗糙的工藝裝飾花卉紋樣（見圖2）。儘管瓷器底部的款識略顯模糊，但可辨認出以青花筆法書寫的「成化年製」銘款，這一銘款自明末以來在景德鎮民窯製作的瓷器中頗為常見。此外，儘管和協翁主逝世的1752年正值乾隆十七年，但該瓷器的粉紅色與黃色的搭配，以及採用漸變技術著色的山茶花花紋，反而展現出與雍正時期樣式相似的特徵（圖13）。基於上述分析，可以推斷該器物大致為雍正至乾隆初期景德鎮民窯製作的粉彩瓷器。

和柔翁主墓，作為其與丈夫黃仁點的合葬墓，於1991年在京畿道富川市被發掘。該墓葬頗為獨特，一同出土了眾多外來工藝品。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件黃色瓷瓶，其器形與清代官窯膽瓶類似（見圖3）。鑒於該墓為和柔翁主及其丈夫昌城尉黃仁點的合葬墓，其製作的最晚年代可以推斷為翁主逝世的1777年至丈夫黃仁點去世的1802年間。該瓷瓶的黃色釉面上以銳器刻畫出唐草紋，類似於清乾隆官窯洋彩中常見的「錦上添花」工藝，且在「玻

㊴《英祖實錄》，英祖三十年（1754）七月十七日，「教曰：『磁器之畫，古用石間朱，今聞以回青畫之云。此亦侈風，此後則畫龍樽外，一切嚴禁。』」收入《朝鮮王朝實錄》，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

㊵《日省錄》，英祖五十二年（1776）一月十二日（甲申），「召接承旨于尊賢閣，令曰和協翁主遷窆日遣內侍致祭祭文令藝文。」收入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璃白」打底之後，飾以粉紅色的月桂花紋。在瓶內部底面上，雖有以紅色顏料書寫銘文的痕跡，但僅餘「日」字清晰可見。此字被認為是「乾」字的一部分，在適宜的光照下，可辨識出篆書體的「乾隆年製」銘文，從而為確定其年代提供了依據（圖14）。與該遺物樣式相同的作品，在當今中國境內、日本乃至西方均有眾多傳世品（圖15）。特別是在景德鎮民窯遺址中出土的完整花卉紋碟，為明確其產地提供了有力證據（圖16）。北京故宮博物院亦收藏有與和柔翁主墓出土瓷器器型和紋樣相近的器物（圖17）。該瓶底部以紅色顏料書有「乾隆年製」款識，清晰表明了其製作年代。然而，由於釉面不均勻，且款識樣式較為粗糙，可以推斷其為民窯製品。[41] 因此，在中國、日本等地出土的類似案例均為民間製作，和柔翁主墓出土的瓷器雖然為王族用品，但推測同樣出自景德鎮民窯的粉彩瓷器。

然而，十八世紀王室隨葬品的出土實例中，一個顯著的現象是，僅在兩位翁主的墓葬中發現了清雍正至乾隆時期景德鎮民窯生產的粉彩瓷器。對比同一時期其他王室墓地的出土情況，例如思悼世子的長子懿昭世孫（卒於1752年）、正祖的首位嬪妃同時也是當時權勢顯赫的洪國榮（1748-1781）之妹元嬪洪氏（卒於1779年）、以及早逝的正祖長子文祜世子（卒於1786年），這些墓葬中普遍出土了進口瓷器。例如，日本有田的青花瓷和景德鎮青花瓷，但未見琺瑯彩繪瓷器。相反，日本風格的彩繪瓷器在這些墓葬中有出土記錄，[42] 包括和協翁主與和柔翁主的墓葬，這表明該類瓷器可能是王室成員普遍使用的器物（圖18）。特別是，粉彩瓷器僅見於翁主墓葬的出土，而在和柔翁主逝世兩年後去世的元嬪洪氏墓中並未發現粉彩瓷器，這一點可能與墓主的身分地位有關。具體而言，這可能與那些在宮中生活並被授予內

---

[41] 王健華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景德鎮民窯瓷器》，卷3（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頁56。

[42] 此處出現的日本式五彩瓷器指的是江戶時代有田地區製作的肥前瓷器。金美京曾指出，在五彩瓷盒上看到的唐草紋樣與日本九州地區的窯——猿川窯出土的青花瓷器陶片的唐草圖案相似。김미경（Kim Mi-kyung），〈19世紀 朝鮮白磁에 보이는 清代 磁器의 影響研究（The Influence of the Qing Porcelain on the 19th Century Joseon White Porcelain）〉（고려대학교 대학원 고고미술사학과 석사논문〔Master's thesis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in Cultural Heritage Course at Korea University〕，2006），頁25。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命婦爵位的嬪妃，以及嫁給士大夫的翁主之間的社會身分有所聯繫。

針對翁主墓中出土的兩件粉彩瓷器的來源背景，根據歷史文獻記載，昌城尉黃仁點在正祖元年（1777）被任命為進賀兼謝恩使，並在1793年之前以使臣身份多次訪問清朝。學術界基於這一歷史記錄，提出了這些粉彩瓷器可能由黃仁點從中國帶回的假設，㊸ 筆者亦大致贊同此觀點。然而，2016年在南楊州市三牌洞發現的和協翁主墓，是與丈夫永城尉申光絢的合葬墓，該墓於1776年遷移至南楊州市平區村之前為初葬地，出土物品主要為翁主個人物品。㊹ 與黃仁點不同，申光絢並無訪問燕京的記錄。因此，和協翁主墓中出土的粉彩杯，很可能並非直接從清朝購得，而是透過第三方在朝鮮獲得，且該第三方必須能夠自由出入清朝。相較於朝鮮的青花瓷器，更為珍貴的清朝彩瓷更容易在民間流通並購買，而有能力購買這些粉彩瓷器的，很可能是隨使節團進入清朝的官商集團。特別是由京商、松商、灣商等組成的燕商，他們隨行參與「會同館開市」和「會同館後市」，其中以漢陽地區為根據地的京商，與貢市人及中央各級機關有著緊密聯繫，並享有特權。㊺ 這些商人成長於首都，與中央軍門、宮房等機構關係密切，並受到這些機構的庇護。㊻ 宮房指的是與王室有密切關係的宮家，負責王室所需物資的調配。㊼ 綜合考

㊸ 방병선（Bang Byung-sun），〈17-18세기 동아시아 도자교류사 연구（Mutual Interactions in Ceramics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17th-18th Centuries）〉，頁142；국립대구박물관（Daegu National Museum），《우리 문화 속의 중국 도자기（*Chinese Ceramics in Korean Culture*）》（대구：국립대구박물관，2004），頁184。

㊹ 《日省錄》，英祖五十二年（1776）一月十二日（甲申），「召接承旨于尊賢閣，令曰和協翁主遷窆日遣內侍致祭祭文令藝文。」收入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

㊺ 이철성（Lee Chul-sung），〈조선후기 무역상인과 정부의 밀무역 대책 -사행무역을 중심으로-（Trading Merchants and Government's Countermeasure Against Smuggling in Late Chosun Dynasty）〉，《사총（*The Historical Journal*）》，58號（2004.3），頁88、93。

㊻ 이철성（Lee Chul-sung），〈조선후기 무역상인과 정부의 밀무역 대책 -사행무역을 중심으로-（Trading Merchants and Government's Countermeasure Against Smuggling in Late Chosun Dynasty）〉，頁93-101。

㊼ 조영준（Cho Young-jun），〈조선후기 궁방（宮房）의 실체（The Reality of Kungbang〔Royal Family House〕in the late Chosŏn Dynasty）〉，《한국학（*The Academy of Korean*）》，第31卷第3號（2008.9），頁279。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量清朝民間可購買的粉彩瓷器狀況，以及朝鮮對清貿易結構，可以推斷和協翁主墓出土的粉彩瓷器很可能是由享有特權的富商——京商，在會同館開市和後市購買後，透過宮房（和協翁主房）轉交給翁主的可能性較高。[48] 換句話說，儘管和協、和柔翁主屬於王室成員，但在宮外居住後，與宮中崇尚節儉的女性不同，他們可能在相對自由的外部空間，透過官商等途徑進行了個人採購。

繼續審視十九世紀的情況，可以發現，相較於十八世紀的案例表現出更為豐富的多樣性。特別是在十九世紀晚期，朝鮮王室所使用的清代琺瑯彩繪瓷器，在單一空間內的使用數量達到了頂峰（圖19）。即便將十八至十九世紀的文獻記載與出土文物合計統計，亦未能超越十九世紀朝鮮王室所使用的琺瑯彩繪瓷器的總量。在儀式中出現的琺瑯彩繪瓷器，主要作為王室儀式或宴會時的陳設用品。然而，根據十九世紀末傳世的朝鮮王室所用琺瑯彩繪瓷器的概況，我們觀察到大部分器物以盆、墩等日常生活用器為主，同時也包括了相當數量的大型器物，以及模仿西洋餐具的器物。這些大型器物和西洋風格餐具很可能多用於王室的宴會等正式場合。鑒於此，我們可以推測，這些琺瑯彩繪瓷器很可能是王室成員的專用物品。與十八世紀情況相似，十九世紀的琺瑯彩繪瓷器亦有可能源自清朝皇帝賜予的官窯製品。此外，考慮到十九世紀末期清代官窯的逐漸衰落，民間琺瑯彩繪瓷器的生產可能獲得了更為寬鬆的環境。基於此，民間琺瑯彩繪瓷器透過朝清貿易進入朝鮮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視。因此，十九世紀朝鮮宮廷所使用的清代琺瑯彩繪瓷器的種類及其傳入途徑，成為了值得進一步探究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可以提出多種假設進行考量。

目前所公開的十九世紀王室所用琺瑯彩繪瓷器共計12件，其中5件帶有「大清乾隆年製」、「同治年製」及「大清同治年製」等銘款（圖20）。儘管「大清乾隆年製」的款識偶爾可見，但學術界普遍觀點認為，從樣式特徵

[48] 김은경（Kim Eun-kyoung），〈18세기 조선 유입 清代 琺瑯瓷器 연구（A Study on the Falangcai Porcelain Introduced to Joseon During the 18th Century）〉，《미술사학연구（*Korean Journal of Art History*）》，293號（2017.3），頁65-93。

臺大學術典藏資料庫

來看，這些瓷器實為同治年間（1862-1874）所製。[49] 無論是否帶有款識，這些瓷器均為十九世紀中後期景德鎮民窯及廣東地區所生產，其工藝質量相對較為粗糙。特別是一件定名為〈粉彩花卉紋碟〉的瓷器，其不僅出現在十九世紀末期王室的傳世品中，也出土於官廳及消費遺址（圖21）。該瓷器以玻璃白為底色，主紋樣為象徵四季更迭的花卉圖案，此類圖案不僅見於碟子，也廣泛出現在碗、盞、湯匙等多種餐具之上。基本圖案通常採用四種或單一花卉紋樣，並常以「囍」、「壽」等吉祥紋樣及詩句、壽桃等作為輔助裝飾，此種風格在同治年間極為流行。相較於中國本土，這類瓷器在清末民初時期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等華僑聚居地的流傳更為廣泛（圖22）。此外，亦有廣東地區製作的廣彩瓷器，如〈白菜蝴蝶紋罐〉，該罐原本為一對，但蓋子已失（圖23）。罐身正面以白菜為主題裝飾，其上繪有呈倒立姿態、展翅欲飛的蝴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白菜因其與「百財」諧音，象徵著財富，故作為吉祥圖案廣受歡迎。此類白菜紋飾的瓷器，從清末至民國初期一直是生產並出口至歐美的代表性商品。根據目前的傳世情況分析，該紋樣的瓷器可能源自福建德化窯或廣東地區。相較於傳世品，德化窯的產品採用五彩技法，紋樣更為簡化，除了題材相似外，在技法與風格上則有顯著差異。而廣東地區生產的白菜紋瓷器，其表現技法精細，常見蝴蝶與白菜一同呈現，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與傳世品的親緣性（圖24、25）。

進一步觀察可知，在朝鮮宮殿遺址中，清代琺瑯彩繪瓷器的出土地點僅限於景福宮與德壽宮。景福宮作為朝鮮時代五座宮殿中最早建立的一座，在壬辰倭亂時期遭到焚毀，後於高宗四年（1867）在興宣大院君（1820-1898）的主持下進行了重建，並一直作為朝鮮王朝的正宮使用至1896年俄館播遷為止。[50] 儘管作為王宮的歷史不足30年，但從出土的器物中，我們依然能夠窺見外來文化的影響。在出土的進口瓷器中，中國生產的瓷器占據了絕大多數，其中包括了大量青花瓷以及少量琺瑯彩繪瓷器。特別是在景福宮的咸和

[49] Kee Ming-Yuet, *Peranakan Chinese Porcelain: Vibrant Festive Ware of the Straits Chinese* (North Clarendon: Tuttle Publishing, 2009), p. 94.

[50]「俄館播遷」是指在明成皇后被殺害的「乙未事變」後，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的高宗和王世子從1896年2月11日開始離開朝鮮王宮，搬到俄羅斯公使館居住約一年的事件。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堂與緝敬堂的行閣遺址上，發現了5件質量較為一般的景德鎮民窯產粉彩瓷器（圖26）。根據歷史記錄，這些場所不僅作為國王的寢殿，同時也是接待外國使節的重要地點。特別是自甲午改革，即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6月之後，景福宮更成為集中接見外國公使的主要場所。㊶

除了宮殿遺址之外，在官衙遺址中亦出土了一些文物，這些文物為我們提供了窺探琺瑯彩繪瓷器使用情況的線索。隨著首爾東大門運動場以及鐘路區清津地區、毋嶽地區一帶的考古發掘工作的開展，雖然出土的十九世紀後期景德鎮民窯生產的粉彩瓷器相對僅占少數（圖27、28），但這一發現仍具有重要意義。東大門運動場是歷史上漢陽都城城牆及訓練都監的分支——「下都監」官廳建築所在地，其歷史僅見於文獻記載。㊷ 清津地區則是朝鮮時代規模最大的常設市場——市廛行廊的所在地，該市場範圍極為廣泛，而粉彩瓷器正是在鐘路清津12至16地區被發現。㊸ 市廛行廊作為朝鮮時代特許的常設市場，其主要職責是為王室採購所需物品，其身份類似於官商，有時也被稱為「唐沙器契」。㊹ 當時，中國瓷器的進口主要依賴這些官商，他們負責將瓷器傳遞進宮。因此，在此地發現的粉彩瓷器，如上文所述，很可能是透

㊶《高宗實錄》31卷，高宗三十一年（1894）六月二十一日，「御咸和堂，接見各國公使，公使等曰：驚動之中，果無受損乎？ 曰：不至受損也。公使等曰：臣等聞此驚報，敢來問候矣。教曰：各國亦有如今日之變乎？公使等曰：各國多有變怪矣。教曰：此後果無他變乎？公使等曰：豈有他事？只望國家永保泰平矣。」收入《朝鮮王朝實錄》，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

㊷ 중원문화재연구（Jungwon Cultural Properties Institute），《동대문 운동장 유적：동대문 역사문화공원 부지 발굴조사 I（*A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Dongdaemun Stadium Site Seoul I*）》（청주：중원문화재연구，2011），頁43。

㊸ 十五世紀至二十世紀朝鮮時代全時期的遺址中，發現粉彩的遺址屬於被斷定為十九世紀的第二文化層。한울문화재연구원（HanU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종로청진 12~16 지구유적 I（*A Report on the Historic Site of Chungjin District 12-16 of JongnoI*）》，頁294。

㊹ 唐沙器契是為了將中國產器皿作為貢品獻上而組織的契，根據記錄，能夠確認其每月都按照用途進貢皇室。《日省錄》，正祖十七年（1793）四月十二日，「……唐沙器契貢人，以為政院所用茶器皿，每朔進排為二三竹，近來則為十餘竹，而至於依幕所用茶器皿，亦無定數俱是，無價進排云……」收入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過隨使節團的官許商人在清朝購買後進入朝鮮，隨後再向朝鮮王室進獻。此外，鑒於市場的特性，也有一部分粉彩瓷器可能在民間流通。

近期在首爾毋嶽2區出土的一批十九世紀末期生產的景德鎮民窯粉彩瓷器，為研究提供了重要實例（圖29）。[55] 該地區的出土文物數量在單一地區中是最多的，[56] 據初步估計，總數超過20件。儘管目前尚未發現能夠明確判定該地區性質的遺跡結構，但從出土文物涵蓋多個時期且相互混雜的情況來分析，可以推斷這是一處被廢棄的遺址。值得注意的是，該遺址出土的粉彩類文物在風格與工藝上與朝鮮王室遺跡中出土的文物具有相似性，且發現了較為精緻的粉彩瓷器。因此，有理由推測，該遺址可能與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時期景福宮或朝鮮王宮遭受破壞和改造過程中所遺棄的物品有關。[57]

正如上文所述，十九世紀末期，在朝鮮宮殿及官廳遺址的考古發掘中，儘管僅出土了少量器物，但景德鎮民窯所產的粉彩及廣彩瓷器的發現頗為頻繁。從現存傳世品至考古出土品的數量來看，其總量已顯著超過十八世紀正祖年間的發現。此一現象反映出，朝鮮以往對於華麗風格的排斥態度已在逐步轉變。

結語：朝鮮對清琺瑯彩繪瓷器的接納態度

如上所述，清代琺瑯彩繪瓷器作為舶來品進入朝鮮，無論其種類如何，包括洋彩、粉彩、廣彩等，主要在朝鮮的上層社會中被使用。儘管在中國本土，隨著景德鎮製瓷業的衰退，琺瑯彩繪瓷器的質量亦有所下降，然而在朝鮮王室的活動中，此類瓷器依然被廣泛使用，並獲得了極高的評價。根據朝

[55] 在部分出土品中，雖然沒有塗粉彩所必須的玻璃白，但是可以確認的是，在顏料的使用方面，使用了琺瑯顏料。

[56] 한울문화재연구원（HanU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서울 무악2구역 유적（*A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Historic Sites in Muak District 2 in Seoul*）》（수원：한울문화재연구원，2018），頁554-555。

[57] 筆者透過與曾參與該遺蹟發掘的明知大學朴正敏教授的交談，對這些遺蹟和出土品進行分析，作為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時期的廢棄遺址，考慮到該地出土品的組合和質量，這裡很有可能是供朝鮮王室所使用的。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鮮王室的傳世文物以及相關的儀式記錄，我們可以觀察到，在十九世紀末期，儘管日本和歐洲的精美瓷器種類繁多，琺瑯彩繪瓷器在社會中的地位並未受到顯著影響。自十八世紀後期起，進口的琺瑯彩瓷主要以朝鮮王室為中心，作為宮中宴會使用的高級器皿和奢侈品。

在朝鮮社會中，對清代琺瑯彩繪瓷器的認知也對朝鮮白瓷產生了顯著影響。朝鮮王室的官方窯廠——分院白瓷，亦開始呈現出琺瑯彩繪瓷器的樣式特徵。其中，乾隆年間製作的〈玻璃胎畫琺瑯福壽八楞瓶〉是一個典型例證，其樣式與朝鮮分院白瓷的〈白瓷青畵壽福紋多角瓶〉基本相似。這件白瓷作品脫離了傳統的朝鮮瓷器風格，以一種新穎的形式呈現，成為受到清代瓷器風格影響的一個代表性產物。[58] 在過去的朝鮮，這種多面體瓶被統稱為「面器」，對於14面的「六八面體」並沒有特別的認識。[59] 在朝鮮白瓷上，圖式化的圓形壽福紋以及其周圍環繞的唐草紋或如意頭紋的組合，與前文所述的玻璃胎畫琺瑯瓶中出現的紋樣極為相似，兩者之間存在密切關聯的事實是顯而易見的。當時製作的清代多面體瓶，僅有此件作品，乃清宮造辦處琺瑯作所製作的御用器物。與此相關，值得關注的是，正祖十一年（1787，乾隆五十二年），乾隆帝賞賜品中所包含的玻璃器皿。[60] 根據文獻記載，乾隆帝曾三次賜予正祖琺瑯器，共計10餘件。在正祖十一年（1787），正祖亦收到了4件玻璃器和4件洋磁琺瑯盒。儘管目前缺乏直接證據，但同樣不能排除乾隆帝所賜玻璃器皿中可能包含〈白瓷青畵壽福紋多角瓶〉的原型的可能性。

---

[58] 共有14面的多面體瓶原本造型是「六八面體（Cuboctahedron）」，由古代希臘數學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 287-212 B.C.E.）所發現。清代多面體相關研究參考，余佩瑾，〈多面體造型及相關問題－以清乾隆朝玻璃胎畫琺瑯黃地福壽八楞瓶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6期（2019），頁51-115、224。

[59] 李夏坤編，《頭陀草》，冊三，「……七十老翁身姓朴，就中稱為善手匠，蟾蜍硯滴最奇品八面唐壺眞好揉，」收入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徐有榘編，《林園經濟志－贍用志》（首爾：林園經濟研究所，2021），卷2「廣州官窯 裝匣鉢燒造者為上 正圓者呼為鶯卵器 十角者呼為十面器 不裝匣鉢而燒造者次之 但能為圓不能作十角八角也。」

[60] 朝鮮的文獻記錄中，並沒有清宮使用的玻璃胎畫琺瑯瓶的具體名稱，但清宮的下賜品中，新出現了玻璃器，琺瑯瓶的名稱。考慮到朝鮮時代主要以品種為主，使用簡潔的名稱的特徵時，玻璃胎畫琺瑯的名稱也有可能簡化為玻璃或琺瑯。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外，朝鮮分院在生產〈白瓷青畫器皿折枝紋湯器〉（圖30）時，模仿了清宮御用瓷器的主要裝飾技法——錦上添花技法。儘管該技法未使用鋒利工具進行刮紋，但與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乾隆洋彩磁〈磁胎畫琺瑯錦上添花白地酒鍾〉（圖31）相似，均採用小筆觸來表現錦上添花的裝飾效果。特別是，主題紋樣被置於背景圖案之前，類似於琺瑯彩繪瓷器，從而展現出了空間感，這表明當時負責繪製的畫工已經正確理解了錦上添花的概念。因此，可以認為清代琺瑯彩繪瓷器對朝鮮後期分院官窯的瓷器生產產生了顯著影響。在這一背景下，原本難以接觸的對象轉變為朝鮮的製瓷技術，或者將其特徵投射到朝鮮白瓷上，間接地追求了社會普遍性。

從以青花瓷為主導的朝鮮陶瓷生產和消費的角度審視，朝鮮後期社會引入並使用清代琺瑯彩繪瓷器的現象顯得尤為罕見。實際上，在十九世紀朝鮮王室傳承的各類進口瓷器中，彩瓷占據了絕大多數。此外，在朝鮮時代的考古發掘中，中國和日本的彩瓷也頻繁出土，這一現象反映出人們對華麗色彩認知的轉變。無疑，這種轉變也是朝清兩國文化交流的結果。自十八世紀後半葉起，透過朝清之間的文化交流，清朝的文物傳入朝鮮，同時伴隨著對這些文物認知的逐漸轉變。[61] 在儒家政治理念為根基且倡導節儉的國家基調影響下，朝鮮彩瓷的使用和生產歷史上曾受到限制。華麗的彩瓷一度被視為奢侈而被排斥。如前文所述，在漢城府內出土的文物中，中國進口的瓷器以青花瓷為主，彩瓷僅占很小的比例。在青花瓷因其使用的昂貴進口顏料而被視為奢侈品的背景下，朝鮮無法自行生產的釉上彩瓷器自然成為了更為奢侈的對象。

然而，對彩瓷的關注與認識達到高潮的時期是在英祖年間（1725-1776），即反清意識逐漸消退之後。自這一時期起，北學論開始受到提倡，而追隨北學論的朝鮮知識分子對清文物進行了積極的評估，並探索了其引進的可能性。[62] 要求校正歷史事實以及保持固有觀念的朝鮮知識分子進行反

---

[61] 김은경（Kim Eun-kyoung），〈조선후기 청 도자의 수용과 인식 변화（Changes of Perception and Acceptance of Qing Dynasty Porcelain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頁63-71。

[62] 김은경（Kim Eun-kyoung），〈조선후기 청 도자의 수용과 인식 변화（Changes of Perception and Acceptance of Qing Dynasty Porcelain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頁43-63。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省，積極評價了清統治的穩定性和文物的成果。[63] 隨著對滿清的反感逐漸轉變為好感，清朝文物不再成為被排斥的對象。在朝鮮，對色彩的認識主要局限於等級秩序的表現以及禮儀的象徵。基於陰陽五行理論的五方正色和間色，在朝鮮時代的服飾、繪畫和室內裝飾等方面得到了廣泛應用。[64] 在朝鮮，色彩的使用原本受到節制，其運用旨在制定尊卑秩序，反映性理學中的等級制度，而色彩的選擇權主要集中在統治階層。然而，隨著清文化的積極引入，十八世紀朝鮮社會對色彩的使用觀念發生了變化，並逐漸擴散至整個社會層面。色彩的選擇不再僅限於士大夫主導的、色彩節制的文人畫風格，而是擴展到了風俗畫和民畫等彩畫領域的發展。換言之，在逐漸包容色彩多樣性的朝鮮社會中，清朝的彩瓷在當時被視為極為成熟的文物。

這種傾向在進入十九世紀後更為明顯。當時彩瓷的消費情況，透過《韓日通商條約締結記念宴會圖》（1883）和威廉・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 1843-1928）著*Corea, the Hermit Nation*（1894）中介紹的例子，可以大概進行推測。[65] 前者確認了兩件在餐桌上用類似布的裝飾物圍繞的中國風彩

---

[63] 이경구（Lee, Kyung-ku），〈조선 후기 주변 인식의 변화와 소통의 가능성 – 18세기 연행록과 북학파를 중심으로（Changes in the Recognizing of China and the Possibility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During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oson Period）〉，《개념과 소통（*Concept and Communication*）》，3號（2009.6），頁99-127。

[64] 中國和朝鮮以正色（五方色：青、黄、赤、白、黑）為第一，其次是間作色（兩種顏色以上混合出現的顏色）。另外，正色和間色意味着身份的尊卑，在服裝顏色上也有差別。《太祖實錄》，太祖七年（1398）六月二十九日，「憲司上言，『先王衣服之制，尊卑有等，正間之色，不可紊亂也。我國家上下服用，尚未有章。願自今進上服用，皆正色，凡男女黄色灰色縞素之衣，一皆禁斷。』上允之。」收入《朝鮮王朝實錄》，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

[65] 威廉・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是在日本和韓國的活動的美國東洋學者，也曾是東京大學教授。於1882年著的*Corea, the Hermit Nat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4) 在紐約首次出版以來，到1911年為止，約30多年間，經過了幾次的增補版。當時，在對韓國幾乎一無所知的情況下，這本書起到了西方人認識韓國的入門書之作用。이영미（Lee Yeong-mi），〈그리피스（W. E. Griffis, 1843~1928）의 한국 인식 변화-『은둔의 나라 한국』（1882~1911）의 재검토를 중심으로 -（William Elliot Griffis' Change of View on Korea - Reconsidering Corea, the Hermit Nation (1882~1911)）〉，《진단학회（*The Journal of the Chin-Tan Society*）》，125號（2015.12），頁94。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色花瓶（圖32）。後者在*Corea, the Hermit Nation*第四版增補版中的朝鮮宴會擺桌中，介紹了一些被推定為裝飾著東洋風花卉紋、山紋、蓮瓣紋彩瓷的器皿（圖33）。威廉・格里菲斯用「一套古老的瓷器和韓國很久以前製造的彩色陶器[faience]」來說明這些器皿。⑯ 然而，這種樣式在當時的朝鮮白瓷上並未出現，因此推測其應為清國或日本的彩瓷。具體而言，在十九世紀末的朝鮮，彩瓷成為了特別宴會上的必備用品。實際上，自1883年仁川開港之後，日本瓷器大量湧入朝鮮市場，成為隨處可見的商品。在朝鮮白瓷逐漸失去信任的背景下，日本瓷器作為替代品而備受青睞。此外，日本為了推廣出口高質量瓷器，於1888年發布了包含18條章程的《朝鮮國輸出一手問屋定款》，進一步促進了日本瓷器在朝鮮國內的普及。⑰ 朝鮮王朝對日本瓷器的顯著需求，不僅源自於對精緻華美且工藝精湛的瓷器的深厚喜好，而且與當時分院官窯勢力的衰退以及進口瓷器的相對易獲得性有著直接的聯繫。然而，儘管存在這種需求，但目前尚未有確鑿的證據能夠明確證實朝鮮王朝對日本彩繪瓷器具有極高的偏好。這一領域的研究仍需進一步深入，以揭示朝鮮王朝對日本瓷器的確切態度和需求背後的複雜因素。

然而，對於清代琺瑯彩繪瓷器而言，情況則略有差異。在十九世紀末，朝鮮為了解除與清朝的附屬國關係，採取了與美國和日本等列強建立守護關係的政治立場。儘管如此，在這一背景下，透過在首爾活動的華商進行的直接貿易，清朝的琺瑯彩繪瓷器仍被購買並供於朝鮮王室。⑱ 或是朝鮮王室親

⑯ William Elliot Griffis, *Corea, the Hermit Nation*, p. 264.

⑰ 中島浩氣，《肥前陶磁史考》（熊本：青潮社，1985），頁195-198。

⑱ 《總關公文》，光緒十八年（1892）八月十三日，「督辦統理交涉通商事務 閔 為關飭事 照得現有內用琉璃燈燭臺等二十二包 又有花砲等一百六十四件由華商 劉煥文 搭付照管 幷已運到仁港 理應免稅 粘開件數 茲特關飭 仰貴署總稅務司查照 轉飭該港稅務司 將該琉璃燈燭臺等二十二包暨花砲等一百六十四件 遵照免稅 以趁急需可也 須至關者 右關 督辦統理交涉通商事務 閔 署理總稅務司史。」收入《各司謄錄》，한국사데이터베이스（韓國史DB），https://db.history.go.kr/.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派人到上海購買了主要出口到南洋一帶的被稱為「上海瓶」⑹ 的琺瑯彩繪瓷器的事實都非常特別。⑺ 當然，十九世紀末期，朝鮮王室使用這些日本或歐洲瓷器的情況也得到確認，但從光武五年（1901），記錄紀念憲宗的繼妃—明憲太后的望八宴（71歲）的《辛丑進饌儀軌》來看，仍然使用著1848年《戊申進饌儀軌》中出現的牡丹花樽，甚至重新使用了8,364餘件被倭沙器擠出市場的唐沙器。⑺ 第二年，即光武六年（1902），高宗望六旬進宴上，足有8,539件的唐沙器被使用，⑺ 宴會用器皿從倭沙器再次變成了唐沙器。

⑹ 上海瓶（Shanghai jar）是指當時居住在南陽一帶的土生華人（Peranakans）在上海主要購買的中國瓷器，以景德鎮民謠中生產的粉彩和光彩為主。Teddy Yong Huei Sim and Sandy Jun Chih Liu, “Studying Nonya Ceramics in the Singapore-Melaka Region and Their Larger Historical and Artistic Background,”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vol. 8-2 (2012.11), p. 280.

⑺ 《總關公文》，光緒十九年（1893）五月十九日，「關飭，全銜，為關飭事，照得現由上海招商局鎮東輪船，搭載荷字號九件，到泊仁川港，此係內用物料，理合準免，茲庸關飭，仰貴總稅務司查照，轉飭該港稅務司，將該荷字箱九件，特準免稅放行可也。須至關者，右關，全銜，總稅務司，馬，光緒十九年五月十九日。」收入《各司謄錄》，한국사데이터베이스（韓國史DB），https://db.history.go.kr/.

⑺ 《辛丑進饌儀軌》，卷之二，光武六年（1901），器用，「平成門內內熟設所所用……四層倭饌盒四坐……砂鉢二竹二箇，砂湯器一百十竹，砂大大楪匙十二竹，砂大楪匙三百三十一竹，砂中楪匙七十五竹，砂小楪匙六十七竹七箇，砂甫兒十一竹五箇，鐘子一百五竹，大碗七竹，小碗八十八竹，砂中缸五竹，砂小缸三竹，以上唐砂器……」收入디지털장서각（Digital Jangseogak藏書閣），https://jsg.aks.ac.kr/dir/view?catePath=&dataId=JSG_K2-2881.

⑺ 《壬寅進饌儀軌》，卷之二，光武六年（1902），器用，「……砂鉢一百十一竹，砂湯器一百八十竹，砂大大楪匙二十竹，砂大楪匙五百竹，砂中楪匙一百二十竹，砂小楪匙一百十竹五箇，砂甫兒二十一竹四箇，砂鍾子一百六十竹、大碗十一竹、小碗一百六竹，砂中缸九竹，砂小缸五竹，以上唐砂器……分院甲燔大楪匙二十一竹、中楪匙二十二竹大楪十七竹、小大楪四竹、種子三竹、甫兒三竹，砂碗五竹，青彩小缸十竹、中缸五竹，龍樽蓋具四雙，砂樽蓋具六雙，龍瓶五雙，白瓶二十五雙，唐砂器大楪匙七十二竹、中楪匙二千三百五十八竹、小楪匙二千七百八十三竹，砂大楪二百六十竹、小大楪二百五十竹、大甫兒二百竹、小甫兒三百八十三竹、種子三百三十八竹，青彩畫砂鉢五箇，青彩畫楪匙六箇，常砂鉢、大楪各五竹，常中楪匙十竹，常湯器、甫兒各十五竹，常種子三竹……」收入디지털장서각（Digital Jangseogak藏書閣），https://jsg.aks.ac.kr/dir/view?catePath=&dataId=JSG_K2-2869.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是此時的大韓帝國，不僅是皇室，日本瓷器在民間的使用也急劇增加，因此日本瓷器的供需完全沒有問題。即使這樣也要換成清朝瓷器的背景是，在以中國為代表的中華秩序中，作為「諸侯國」的朝鮮，在1897年宣佈成為大韓帝國後，隨著高宗皇帝的即位，升格為「天子國」。當時的朝鮮為了提高皇室的權威，宗廟和國家禮儀都升格為皇帝國制度。⑬ 1897年高宗皇帝即位後，參奉徐相懋（1856-1925）和金連植（1857-?）在上書中展現出的對「朝鮮是繼承明朝系統的具有正統性的國家」這一事實的認知得到了充分的證明。⑭ 朝鮮成為大韓帝國後，所有體系都要符合與清朝同等的天子的規格。朝鮮的這種立場透過1899年與清朝簽訂《大韓國・大清國通商條約》得到了很好地體現。即，對於朝鮮來說，該條約的意義在於展現了作為同等天子國的自信。特別是光武六年（1902），透過記錄可以明確的確認朝鮮作為皇帝國，將禮樂和刑政、典章以及文物都按照天子的制度來書寫。⑮ 並且，禮制

⑬ 이현진（Lee Hyun-jin），〈대한제국의 선포와 종묘 제도의 변화 -칠묘（七廟）의 구성과 황제 추존, 신주 개제（改題）를 중심으로（The Foundation of the Daehan Empire, and the Changes the National Shrine Went Through）〉，《한국사상사학회（*The Study of Korean History of Thought*）》，40號（2012.4），頁511。

⑭ 《承政院日記》，光武元年（1897）九月二十八日，「前參奉徐相懋·金連植等疏曰，伏以，皇天眷佑我東邦，錫我陛下以聰明睿智之姿，神武剛大之德。遂紹有明之統，卽天子之位，此檀·箕以來肇有之慶，而億萬年無疆之休……自唐·虞·夏·殷·周，以至漢·唐·宋·明，曆數相繼，三正相因，雖秦·隋之混一，不能為正統，而不過一閏位也。蜀漢·東晉，偏據一隅，而綱目大書年號，此春秋大一統之義也……伏願陛下，一尊漢·明舊制，爵用金紫·銀靑等階，官用尚書·侍郎等號，……冠帶彬彬，謂之大國，衣而不帶，謂之昌披。以堂堂帝國之人士，只一周衣而無帶，豈非盛代之欠事乎？朝服因舊為之，……省疏具悉。自謂識時務，而實不識時務矣。」收入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

⑮ 《承政院日記》，光武六年（1902）四月三日，「……洪惟我大皇帝陛下，膺千一之運，登九五之位，基舊邦而肇新命，誕有天下，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皆用天子之事，而惟於學宮，獨稱諸侯之舊號，豈非名實不相孚之大者乎？……」收入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宴會禮器的使用也普遍選擇明、清時期的傢俱、金銀器、玉器等。⑯ 就是說，儘管日本文化在社會上廣泛擴散，但在傳統的皇室活動中，還是喜愛同是天子國的中國的器物。皇室的活動就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以加強國家地位和皇權為目的而舉行的，⑰ 光武五年（1901）的進饌也是一樣的。因此，作為繼承明代正統性的天子國在舉辦的皇室活動中，比起日本瓷器，使用中國瓷器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換句話說，在展示大韓帝國皇室的尊嚴和權威的正式活動中，使用洋彩或唐沙器這一點，可以看作是直接或間接地表現出繼承了天子國的正統性。⑱

十九世紀末，朝鮮已經出現了精心製作的日本和歐洲的進口瓷器。儘管如此，還是執意去額外獲取琺瑯彩繪瓷器，並用於各種儀禮和宴會等公開場合，這一點非常有趣。固然有各種原因，但在當時的清皇室中，琺瑯彩和洋彩仍然固守著皇室瓷器的地位。從這一情況來看，朝鮮作為與清同等的天子國，也認為琺瑯彩繪瓷器（或唐沙器）是皇室的權威象徵。朝鮮不僅進口了清朝和日本的彩瓷，還進口了西歐的彩瓷，並作為外交手段之一用於各種宴會等公開場合，彰顯了近代國家的實力。也就是說，開港以後，彩瓷不再是被摒棄的奢侈品，而是成為了一個自強的近代國家為克服時代巨變所產生的

⑯ 조시내（Jo Si-nae），〈대한제국기 宮中 宴享用 家具 연구（Royal Court Banquet Furniture of the Korean Empire Period）〉，《미술사학연구（*Korean Journal of Art History*）》，264號（2009.12），頁127-157；조시내（Jo Si-nae），〈한국 근대 궁궐건축의 공간과 장식 특성 연구（A Study on the Space and Decorative Art of Palace Architecture in the Modern Period of Korea）〉（홍익대학교대학원 한국미술사전공 박사논문〔Ph.D. thesis on art history at Hongik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2022）。

⑰ 조시내（Jo Si-nae），〈대한제국기 宮中 宴享用 家具 연구（Royal Court Banquet Furniture of the Korean Empire Period）〉，頁128。

⑱ 朝鮮不僅從中國學習了技術，還受容了學術和文藝，這與日本不同，只引進了日本的技術，十八至十九世紀儀軌中登場的清代瓷器與可視化王室權威或威嚴有關聯。최경화（Choi Kyung-hwa），〈朝鮮後期 分院里 時期 官窯白磁 研究：1752-1895년을 중심으로（A Study on White Porcelains Produced in the Royal Kilns During the Period of *Bunwonri*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From 1752 to 1895）〉（이화여자대학교 대학원 미술사학과 박사논문〔Ph.D. thesis on art history at Ewha Women's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2014），頁16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混亂，跟隨時代潮流，展現幹練形象的最佳手段。透過之前觀察過的景福宮、德壽宮、官廳遺蹟等中均勻出土的清朝和日本的彩瓷，也可以推測出這一點。朝鮮末期對彩瓷的接納和使用並不是單純的取向和美感問題，而是史無前例的變化和具有挑戰性的文化現象。

（責任編輯：陳卉秀）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李夏坤編
《頭陀草》，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檢索日期：2022年2月10日）。
李德懋編
《青莊館全書》，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檢索日期：2022年3月8日）。
（清）承文院
《同文彙考》，디지털장서각（Digital Jangseogak藏書閣），https://jsg.aks.ac.kr/dir/view?dataId=JSG_K2-3474（檢索日期：2022年2月1日）。
（清）周煌編
《琉球國志略》，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152991（檢索日期：2022年2月20日）。
洪大容編
《湛軒書》，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檢索日期：2022年3月17日）。
徐有榘編
《林園經濟志－贍用志》，首爾：林園經濟研究所，2021。
（清）唐英
《陶冶圖說》，收入張發穎編，《唐英督陶文檔》，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
（清）梁廷枏編
《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2013。
（清）陳瀏（寂園叟）
〈匋雅〉，收入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編，《中國古代陶瓷文獻輯錄-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15。
（民國）許之衡著；杜斌編
《飲流齋說瓷》，北京：中華書局，2015。
《日省錄》，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檢索日期：2022年4月3日）。
《承政院日記》，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檢索日期：2022年4月5日）。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朝鮮王朝實錄》，한국고전종합DB（韓國古典綜合DB），https://db.itkc.or.kr/（檢索日期：2022年2月13日）。
《壬辰進饌儀軌》，디지털장서각（Digital Jangseogak藏書閣），https://jsg.aks.ac.kr/dir/view?dataId=JSG_K2-2880（檢索日期：2021年11月17日）。
《辛丑進饌儀軌》，디지털장서각（Digital Jangseogak藏書閣），https://jsg.aks.ac.kr/dir/view?catePath=&dataId=JSG_K2-2881（檢索日期：2021年11月14日）。
《壬寅進饌儀軌》，디지털장서각（Digital Jangseogak藏書閣），https://jsg.aks.ac.kr/dir/view?catePath=&dataId=JSG_K2-2869（檢索日期：2021 年 11 月 17 日）。
《總關公文》，《各司謄錄》，한국사데이터베이스（韓國史DB），https://db.history.go.kr/（檢索日期：2022年2月3日）。

近人論著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王澈編選
2001 〈雍正元年御筆賞賜簿〉，《歷史檔案》，3期，頁18-30。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 Wang, Che compiled
2001 "Yongzheng yuannian yubi shangci bu (The Notebook on Recording the Awards and the Words Written by the Emperor in the 1st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Yong Zheng)," *Historical Archives*, no. 3, pp. 18-30.
王健華
1993 〈清代宮廷琺瑯彩綜述〉，《故宮博物院院刊》，3期，頁52-62。
Wang, Jianhua
1993 "Qingdai gongting falangcai zongshu (A Review of Falangcai of the Qing Imperial Court),"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3, pp. 52-62.
王健華主編
2014 《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景德鎮民窯瓷器》，卷3，北京：故宮出版社。
Wang, Jianhua ed.
2014 *The Porcelain of Jingdezhen Civilian Kilns of Qing Dynasty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vol. 3, Beijing: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汪慶正
1981 〈"粉彩"即"洋彩"考〉，《上海博物館集刊》，1期，頁92-94。
Wang, Qingzheng
1981 "'Fencai' ji 'Yangcai' kao (Famille Rose as Foreign Colors)," *The Bulletin of the Shanghai Museum*, no. 1, pp. 92-94.
余佩瑾
2017 〈清宮傳世「仿洋瓷瓶」及相關問題〉，《故宮文物月刊》，410期，頁78-89。
2019 〈多面體造型及相關問題－以清乾隆朝玻璃胎畫琺瑯黃地福壽八楞瓶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6期，頁51-115、224。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Yu, Pei-chin

2017 "Qinggong chuanshi 'Fangyangciping' ji xiangguan wenti (Heritage of the Qing Court: Tall Ceramic Vases, Foreign Imitations),"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no. 410, pp. 78-89.

2019 "Polyhedron and Its Formation: A Glass Octagonal Vase during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in the Qing Dynasty,"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46, pp. 51-115, 224.

周覺民

2003 〈官窯"洋彩"與民窯"粉彩"〉,《陶瓷學報》, 第24卷第3期, 頁177-180。

Zhou, Juemin

2003 "Imperial Ware's Foreign Enamel and Civilian Ware's Famille-Rose," *Journal of Ceramics*, vol. 24, no. 3, pp. 177-180.

施靜菲、彭盈真

2012 〈從文化脈絡探討清代釉上彩名詞—琺瑯彩、洋彩與粉彩〉,《故宮學術季刊》, 第29卷第4期, 頁1-74。

Shih, Ching-fei, and Ying-chen Peng

2012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ree Terms for Qing Dynasty Overglazed Enamels: *Falangcai, Yangcai, and Fencai*,"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29, no. 4, pp. 1-74.

許曉東

2010 〈康熙、雍正時期宮廷與地方畫琺瑯技術的互動〉, 收入故宮博物院、柏林馬普學會科學史所編,《宮廷與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技術交流》,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頁277-335。

Xu, Xiaodong

2010 "Kangxi, Yongzheng shiqi gongtig yu defang huafalang jishu de huodong (The Technology Exchanges in Painted Enamel Between the Imperial Court and District During the Periods of Kangxi and Yongzheng Reign)," in The Palace Museum,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ds., *Gongting yu difang : Shiqi zhi shiba shiji de jishu jiaoliu* (Imperial Court and District: The Technology Exchanges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Beijing: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pp. 277-335.

馮明珠編

2016 《嘉慶君・遊臺灣—清仁宗文物特展》,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Feng, Ming-chu ed.

2016 *Lord Jiaqing and the Journey to Taiwan : A Special Exhibtion on Cultural Artifacts the of Qing Emperor Renzong*,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廖寶秀

2009 〈乾隆磁胎洋彩綜述〉, 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華麗彩瓷：乾隆洋彩》,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頁10-3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Liao, Pao-show
2009 “Qianlong citai yangcai zongshu (A Review of Yangcai Painted Enamels During Qianlong Reign),” i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d., *Stunning Decorative Porcelains from Ch’ien-Lung Reign*,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pp. 10-31.
德化縣人民政府編
2011 《德化陶瓷博物館藏精品集萃》，福州市：海風出版社。
Dehuaxian renmin zhengfu (Dehua County People’s Government) ed.
2011 *Dehua taoci bowuguan cang jingpin jicui* (The Featured Collections of the Dehua Ceramic Museum), Fuzhoushi : Haifeng chubanshe.
謝明良
2014 〈關於金琺瑯靶碗〉，《故宮文物月刊》，372期，頁80-90。
Hsieh, Ming-liang
2014 “Guanyu jinfalang bawan (The Stem Bowl in Golden Enamel),”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no. 372, pp. 80-90.
中島浩氣
1985 《肥前陶磁史考》，熊本：青潮社。
Nakajima, Hiroshi
1985 *Hizen tōji-shi kō* (The History of Hizen Ceramics), Kumamoto: Seichosha.
京都国立博物館
2013 《魅惑の清朝陶磁》，京都：京都国立博物館。
Kyoto National Museum
2013 *Captivating Qing-dynasty Ceramics*, Kyoto: Kyoto National Museum.
방병선
2001 〈17-18세기 동아시아 도자교류사 연구〉，《미술사학연구》，232號，頁131-155。
2007 〈이형록의 책가문방도 팔곡병에 나타난 중국도자〉，《강좌미술사》，28號，頁209-238。
2015 〈청대 중서（中西）도자 교류의 표상, 광채（廣彩）〉，《한국근현대미술사학》，29集，頁33-61。
Bang, Byung-sun
2001 “17-18 segi dongasia doja gyoryusa yeongu (Mutual Interactions in Ceramics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17th-18th Centuries),” *Misulsahag yeongu* (Korean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232, pp. 131-155.
2007 “Yi Hyungrok ui chaekgamunbangdo palgokbyeong e natanan jungguk doja (Chinese Ceramics Shown on the Yi Hyungrok (1808-1863?)’s Eight-Folded Screen of Painting: Scholar’s Items and Books and Bookshelves (Chaekgamoonbangdo)),” *Gangjwa misulsa* (The Art History Journal), no. 28, pp. 209-238.
2015 “Cheongdae jungseo doja gyoryu ui pyosang, gwangchae (A Study of Guangcai: Symbol of Cultural Exchange of China and Europe in the Qing Dynasty (1636-1912)),” *Hanguk*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geunhyeondae misulsahak (Journal of Korean Modern & Contemporary Art History), no. 29, pp. 33-61.

조영준

2008 〈조선후기 궁방(宮房)의 실체〉,《한국학》, 第31卷第3號, 頁273-304。

Cho, Young-jun

2008 "Joseon hugi gungbang (宮房) ui silche (The Reality of Kungbang (Royal Family House) in the Late Chosŏn Dynasty)," *Hangukhak* (The Academy of Korean), vol. 31, no. 3, pp. 273-304.

최경화

2014 〈朝鮮後期 分院里 時期 官窯白磁 研究：1752-1895년을 중심으로〉, 이화여자대학교 대학원 미술사학과 박사논문。

Choi, Kyung-hwa

2014 "Joseon hugi bunwonri sigi gwanyo baekja yeongu: 1752-1895nyeoneul jungsimeuro (A Study on White Porcelains Produced in the Royal Kilns During the Period of Bunwonri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From 1752 to 1895)," Ph.D. thesis on art history at Ewha Womans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국립대구박물관

2004 《우리 문화 속의 중국 도자기》, 대구：국립대구박물관。

Daegu National Museum ed.

2004 *Uri munhwa sogui jungguk dojagi* (Chinese Ceramics in Korean Culture), Daegu: Daegu National Museum.

경기도자박물관

2009 《분원백자전Ⅰ：조선후기 청화백자》, 경기도：경기도자박물관。

Gyeonggi doja bangmulgwan (Gyeonggi Museum of Contemporary Ceramic Art) ed.

2009 *Bunwon baekja jeon I– Joseon hugi cheonghwabaekja* (Bunwon Porcelains Ⅰ: Late Joseon Blue and White), Gyeonggido: Gyeonggi doja Bangmulgwan (Gyeonggi Museum of Contemporary Ceramic Art).

한울문화재연구원

2013 《종로청진 12~16 지구유적Ⅰ》, 수원：한울문화재연구원。

2013 《종로청진 8 지구유적 Ⅰ》, 수원：한울문화재연구원。

2018 《서울 무악2구역 유적》, 수원：한울문화재연구원。

HanU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ed.

2013 *Jongro cheongjin 12-16 jigu yujeok I* (A Report on the Historic Site of Chungjin District 12-16 of JongnoⅠ), Suwon: HanU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2013 *Jongro cheongjin 8 jigu yujeok I* (A Report on the Historic Site of Chungjin District 8 of JongnoⅠ), Suwon: HanU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2018 *Seoul muak2guyeok yujeok* (A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Historic Sites in Muak District 2 in Seoul), Suwon: HanU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조시내
2009 〈대한제국기 宮中 宴享用 家具 연구〉,《미술사학연구》, 264號，頁127-157。
2022 〈한국 근대 궁궐건축의 공간과 장식 특성 연구〉, 홍익대학교대학원 한국미술사전공 박사논문。
Jo, Si-nae
2009 "Daehan jegukgi gungjung yeonhyangyong gagu yeongu (Royal Court Banquet Furniture of the Korean Empire Period)," *Misulsahag yeongu* (Korean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264, pp. 127-157.
2022 "Hanguk geundae gunggwol geonchugui gonggangwa jangsik teukseong yeongu (A Study on the Space and Decorative Art of Palace Architecture in the Modern Period of Korea)," Ph.D. thesis on art history at Hongik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중원문화재연구원
2011 《동대문 운동장 유적：동대문 역사문화공원 부지 발굴조사 Ⅰ》, 청주：중원문화재연구원。
Jungwon Cultural Properties Institute ed.
2011 *Dongdaemun undongjang yujeok: dongdaemun yeoksa munhwagongwon buji balguljosa* (A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Dongdaemun Stadium Site, Seoul Ⅰ), Cheongju: Jungwon Cultural Properties Institute.
김은경
2012 〈책거리에 등장하는 중국 도자의 함의 – 장한종, 이형록의 책거리를 중심으로〉,《조선 선비의 서재에서 현대인의 서재로》, 경기도：경기도박물관，頁188-203。
2016 〈19세기 조선왕실 소용 청대 유상채 자기 연구〉,《강좌미술사》, 46號，頁135-163。
2017 〈18세기 조선 유입 清代 琺瑯瓷器 연구〉,《미술사학연구》, 293號，頁65-93。
2018 〈조선후기 청 도자의 수용과 인식 변화〉,《한국학연구》, 66集，頁39-77。
Kim, Eun-kyoung
2012 "Chaekgeorie deungjanghaneun jungguk doja ui hamui – Jang han-jong, L hyeong-rogui chaekgeorireul jungsimeuro (The Meaning of Chinese Porcelain in Chaekgeori Painting – Chaekgeori Paintings of Jang Han-jong and Yi Hyeong-rok)," in *Special Exhibition on Joseon seonbiui seojaeeseo hyeondaeinui seojaero* (Chaekgeori Screen Paintings: History of Studies from the Joseon Dynasty to Modern Times), Gyeonggido: Gyeonggi Provincial Museum, pp. 188-203.
2016 "19segi Joseon wangsil soyong cheongdae yusangchae jagi yeongu (A Study on Qing Porcelain with Overglaze Decoration Used by the Joseon Royal Family in the 19th Century)," *Gangjwa misulsa* (The Art History Journal), no. 46, pp. 135-163.
2017 "18segi joseon yuip cheongdae beoprangjagi yeongu (A Study on the Falangcai Porcelain Introduced to Joseon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Misulsahag yeongu* (Korean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293, pp. 65-93.
2018 "Joseon hugi cheong doja ui suyongg wa insik byeonhwa (Changes of Perception and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Acceptance of Qing Dynasty Porcelain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Hangukhag yeongu* (Center for Korean Studies), no. 66, pp. 39-77.

김미경

2006〈19世紀 朝鮮白磁에 보이는 淸代 磁器의 影響 硏究〉，고려대학교 대학원 고고미술사학과 석사논문。

Kim, Mi-kyung

2006 "19segi joseonbaekja e boineun cheongdae jagi ui yeonghyang yeongu (The Influence of the Qing Porcelain on the 19th Century Joseon White Porcelain)," Master's thesis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in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Course at Korea University.

이철성

2004〈조선후기 무역상인과 정부의 밀무역 대책 –사행무역을 중심으로–〉，《사총》，58號，頁83-117。

Lee, Chul-sung

2004 "Joseon hugi muyeoksangin gwa jeongbu ui milmuyeok daechaek –saHaeng muyeog eul jungsimeuro (Trading Merchants and Government's Counter Measure Against Smuggling in Late Chosun Dynasty)," *Sa Chong* (The Historical Journal), no. 58, pp. 83-117.

이현진

2012〈대한제국의 선포와 종묘 제도의 변화 –칠묘（七廟）의 구성과 황제 추존, 신주 개제（改題）를 중심으로〉，《한국사상사학회》，40號，頁499-538。

Lee, Hyun-jin

2012 "Daehanjegug ui seonpo wa Jongmyo (七廟) jedo ui byeonhwa –chilmyo ui guseonggwa hwangje chujon, sinju gaejer (改題) eul jungsimeuro (The Foundation of the Daehan Empire, and the Changes the National Shrine Went Through)," *Hanguk sasang sahakhoe* (The Study of Korean History of Thought), no. 40, pp. 499-538.

이경구

2009〈조선 후기 주변 인식의 변화와 소통의 가능성 - 18세기 연행록과 북학파를 중심으로〉，《개념과 소통》，3號，頁99-127。

Lee, Kyung-ku

2009 "Joseon hugi jubyeon insig ui byeonhwa wa sotong ui ganeungseong – 18segi yeonhaengrok gwa bukhakpa reul jungsimeuro (Changes in the Recognizing of China and the Possibility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During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oson Period)," *Gaenyeomgwa sotong* (Concept and Communication), no. 3, pp. 99-127.

이영미

2015〈그리피스（W. E. Griffis, 1843~1928）의 한국 인식 변화-『은둔의 나라 한국』（1882~1911）의 재검토를 중심으로 -〉，《진단학회》，125號，頁93-119。

Lee, Yeong-mi

2015 "Geuripiseu (W. E. kriffit, 1843~1928) ui hanguk insik byeonhwa-『Eundunui nara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hanguk』(1882~1911) ui jaegeomtoreul jungsimeuro (William Elliot Griffis' Change of View on Korea - Reconsidering Corea, the Hermit Nation (1882~1911)," *Jindan hakhoe* (The Journal of the Chin-Tan Society), no. 125, pp. 93-119.

국립중앙박물관

2007 《중국도자：국립중앙박물관소장》，서울：국립중앙박물관。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ed.

2007 *Jungguk doja: Gukrip jungang bakmulgwan sojang* (Chinese Ceramics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Seoul: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서울역사박물관

2006 《서울의 도요지와 도자기》，서울：서울역사박물관。

Seoul Museum of History ed.

2006 *Seour ui doyoji wa dojagi* (The Kiln Sites and Ceramics of Seoul), Seoul: Seoul Museum of History.

궁중유물전시관

1997 《기증유물도록》，서울：궁중유물전시관。

1997 《오얏꽃 황실생활유물》，서울：궁중유물전시관。

The Royal Museum ed.

1997 *Gijeung yumul dorok* (Special Exhibition on the Donated Collection), Seoul: The Royal Museum.

1997 *Oyatkot hwangsil saenghwar yumul* (Oyat Flower (White Plum Flower), The Imperial Household Relics), Seoul: The Royal Museum.

Griffis, William Elliot

1894 *Corea, the Hermit Nat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Kee, Ming-Yuet

2009 *Peranakan Chinese Porcelain: Vibrant Festive Ware of the Straits Chinese*, North Clarendon: Tuttle Publishing.

Sim, Teddy Yong Huei, and Sandy Jun Chih Liu

2012 "Studying Nonya Ceramics in the Singapore-Melaka Region and Their Larger Historical and Artistic Background,"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vol. 8-2, pp. 265-290.

網路論文與資料庫

규장각 원문검색서비스 (Gyujanggak Original Text Search Service)

https://kyudb.snu.ac.kr/（檢索日期：2022年4月15日）。

Sotheby's

https://www.sothebys.com/en/buy/auction/2020/important-chinese-art-3/a-rare-turquoise-ground-famille-rose-double（檢索日期：2023年6月5日）。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Christie’s
https://onlineonly.christies.com/s/dressing-table-contemporary-fine-dining/composite-chinese-export-porcelain-cabbage-leaf-pattern-part-dinner-19/80146（檢索日期：2022年3月16日）。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五彩花卉紋盒與碗，明萬曆，淑慎公主（1634-1645）墓中出土，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圖版取自국립중앙박물관（National Museum of Korea），《중국도자：국립중앙박물관소장（Chinese Ceramics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서울：국립중앙박물관，2007），頁320。

圖2　粉彩花卉紋杯，朝鮮，和協翁主（1733-1752）墓出土，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筆者攝影。

圖3　粉彩黃地月季紋瓶，清乾隆，朝鮮，和柔翁主（1740-1777）墓出土，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圖4　玻璃胎畫琺瑯福壽八楞瓶，清乾隆，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筆者攝影。

圖5　白瓷青畵壽福紋多角瓶，朝鮮，十九世紀，韓國，個人所藏，圖版取自경기도자박물관（Gyeonggi Museum of Contemporary Ceramic Art），《분원백자전Ⅰ：조선후기 청화백자（*Bunwon Porcelains: Late Joseon Blue and White*）》（경기도：경기도자박물관，2009），頁67。

圖6　粉彩透彫唐草紋雙耳壺，清乾隆，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7　《戊申進饌儀軌》中，〈牡丹花樽〉（局部），朝鮮，憲宗十四年（1848）。圖版取自규장각 원문검색서비스（Gyujanggak Original Text Search Service），網址：https://kyudb.snu.ac.kr/ImageServlet.do?imgFileNm=GK14372_00IH_0001_0078.jpg&path=/data01/stream/GAE/IMG/GK14372_00/GK14372_00_0001/GK14372_00IH_0001_0078.jpg。

圖8　《戊申進饌儀軌》中，〈花樽〉（局部），朝鮮，憲宗十四年（1848）。圖版取自규장각 원문검색서비스（Gyujanggak Original Text Search Service），網址：https://kyudb.snu.ac.kr/ImageServlet.do?imgFileNm=GK14372_00IH_0001_0055.jpg&path=/data01/stream/GAE/IMG/GK14372_00/GK14372_00_0001/GK14372_00IH_0001_0055.jpg。

圖9　粉地粉彩寶相花雙喜大碗，清道光，湖北省博物館藏。

圖10　粉彩松綠地番蓮雙喜茶壺，清道光，Sotheby's，網址：https://www.sothebys.com/en/buy/auction/2020/important-chinese-art-3/a-rare-turquoise-ground-famille-rose-double。

圖11　《戊子進爵儀軌》中，〈獻天花瓶〉（局部），朝鮮，純祖二十八年（1828）。圖版取自규장각 원문검색서비스（Gyujanggak Original Text Search Service），網址： https://kyudb.snu.ac.kr/ImageServlet.do?imgFileNm=GK14364_00IH_0001_0108.jpg&path=/data01/stream/GAE/IMG/GK14364_00/GK14364_00_0001/GK14364_00IH_0001_0108.jpg。

圖12　《戊子進爵儀軌》中，〈沈香花瓶〉（局部），朝鮮，純祖二十八年（1828）。圖版取自규장각 원문검색서비스（Gyujanggak Original Text Search Service），網址：https://kyudb.snu.ac.kr/ImageServlet.do?imgFileNm=GK14364_00IH_0001_0107.jpg&path=/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data01/stream/GAE/IMG/GK14364_00/GK14364_00_0001/GK14364_00IH_0001_0107.jpg。https://kyudb.snu.ac.kr/ImageServlet.do?imgFileNm=GK14364_00IH_0001_0088.jpg&path=/data01/stream/GAE/IMG/GK14364_00/GK14364_00_0001/GK14364_00IH_0001_0088.jpg。

圖13　粉彩折枝花卉紋盤，清雍正，景德鎮陶瓷博物館藏，筆者攝影。

圖14　粉彩黃地月季紋瓶（底部），清乾隆，朝鮮，和柔翁主（1740-1777）墓出土，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筆者攝影。

圖15　粉彩黃地月季紋碗，清乾隆，日本，野崎家塩業歷史館藏，圖版取自京都国立博物館，《魅惑の清朝陶磁》（京都：京都国立博物館，2013），頁95，圖版95。

圖16　粉彩黃地月季紋盤，清，景德鎮市出土，景德鎮民窯博物館藏。

圖17　黃地軋道粉彩花卉紋膽瓶，清乾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王健華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景德鎮民窯瓷器》，卷3（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頁56，圖19。

圖18　日本肥前瓷器，朝鮮，元嬪洪氏（1766-1779）墓出土，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筆者攝影。

圖19　十九世紀朝鮮王室所用的清代琺瑯彩繪瓷器，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圖20　十九世紀朝鮮王室所用的清代琺琅彩瓷中的清末（同治-光緒）款式，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圖版取自궁중유물전시관（The Royal Museum），《오얏꽃 황실생활유물（*Oyat Flower (White Plum Flower), The Imperial Household Relics*）》（서울：궁중유물전시관，1997），頁9。

圖21　粉彩四節花卉紋碟，清，十九世紀，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궁중유물전시관（The Royal Museum），《오얏꽃 황실생활유물（*Oyat Flower (White Plum Flower), The Imperial Household Relics*）》，頁32。

圖22　粉彩花卉紋碟，清同治，新加坡，個人所藏，圖版取自Kee Ming-Yuet, *Peranakan Chinese Porcelain: Vibrant Festive Ware of the Straits Chinese* (North Clarendon: Tuttle Publishing, 2009), p. 94.

圖23　白菜蝴蝶紋罐，清，十九世紀，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궁중유물전시관（The Royal Museum），《오얏꽃 황실생활유물（*Oyat Flower (White Plum Flower), The Imperial Household Relics*）》，頁11。

圖24　五彩白菜紋碗，清，十九世紀，德化陶瓷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德化縣人民政府編，《德化陶瓷博物館藏精品集萃》（福州市：海風出版社，2011），頁134，圖版166。

圖25　廣彩白菜紋餐具套裝，清末民初，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Christie's，圖版取自Christie's網站，網址：https://onlineonly.christies.com/s/dressing-table-contemporary-fine-dining/composite-chinese-export-porcelain-cabbage-leaf-pattern-part-dinner-19/80146.

圖26　粉彩四節花卉紋碟片，清，十九世紀，景福宮咸和堂與緝敬堂出土，韓國，國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圖版取自서울역사박물관（Seoul Museum of History），《서울의 도요지와 도자기（*The Kiln Sites and Ceramics of Seoul*）》（서울：서울역사박물관，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6），頁130，圖138。

圖27　粉彩四節花卉紋碗，清，十九世紀，首爾鐘路區清進12-19地區出土，首爾歷史博物館藏。

圖28　粉彩四節花卉紋碗及碟，清，十九世紀，首爾東大門運動場出土，首爾歷史博物館藏，圖版取自한울문화재연구（HanU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종로청진 12~16 지구유적 I（*A Report on the Historic Site of Chungjin District 12-16 of JongnoI*）》（수원：한울문화재연구원，2013），頁294。

圖29　粉彩花卉紋碗片，清，十九世紀，首爾毋岳2區出土，韓國，漢城百濟博物館藏，筆者攝影。

圖30　白瓷青畫器皿折枝紋湯器，朝鮮，十九世紀，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圖31　磁胎畫琺瑯錦上添花白地酒鍾，清乾隆，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2　安中植，《韓日通商條約簽訂紀念宴會圖》，朝鮮，1883年，崇實大學韓國基督教博物館藏。

圖33　William Elliot Griffis, *Corea, the Hermit Nation*,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4), p. 264中的插圖。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　五彩花卉紋盒與碗　明萬曆　淑慎公主（1634-1645）墓中出土
韓國　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圖2　粉彩花卉紋杯　朝鮮　和協翁主（1733-1752）墓出土　韓國　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 粉彩黃地月季紋瓶 清乾隆
朝鮮 和柔翁主（1740-1777）墓出土
韓國 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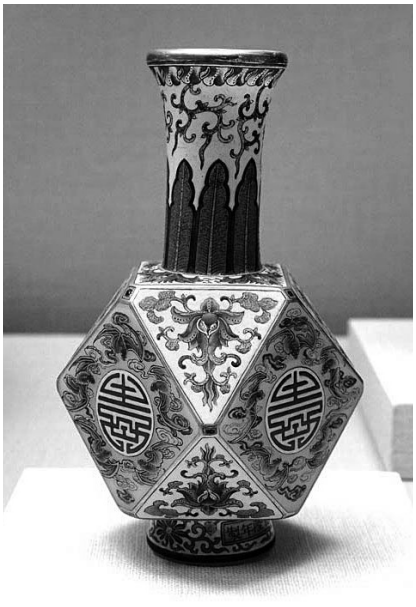


圖4 玻璃胎畫琺瑯福壽八楞瓶 清乾隆
臺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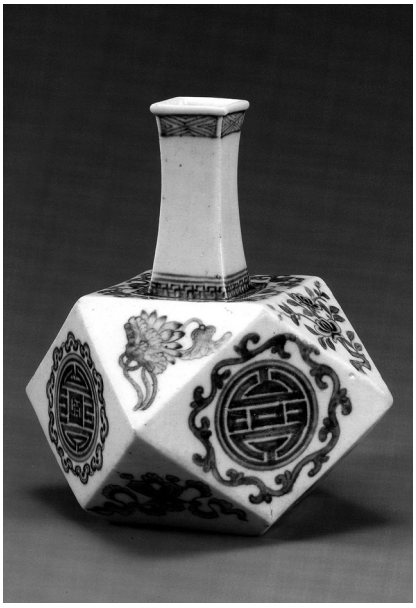


圖5 白瓷青畫壽福紋多角瓶 朝鮮
十九世紀 韓國 個人所藏



圖6 粉彩透彫唐草紋雙耳壺 清乾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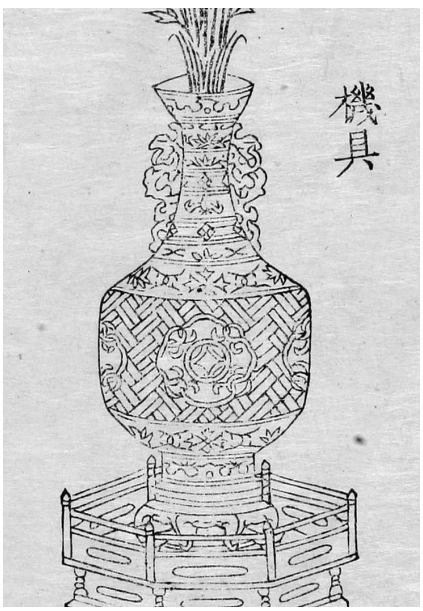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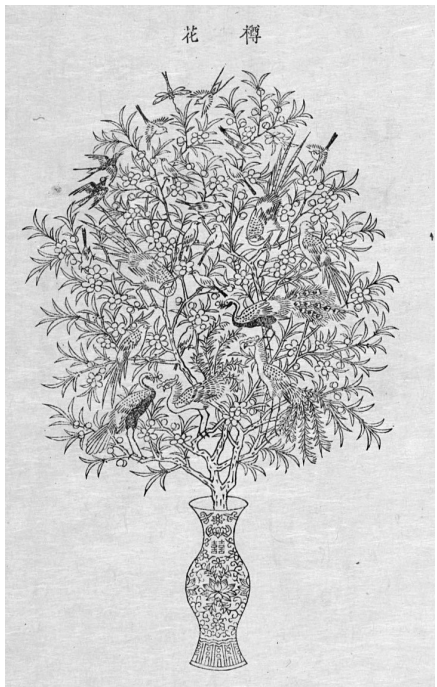


圖7　《戊申進饌儀軌》中　〈牡丹花樽〉（局部）　朝鮮　憲宗十四年（18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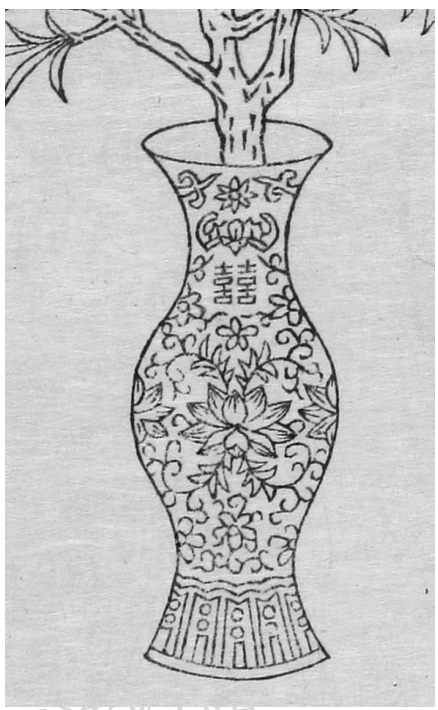


圖8　《戊申進饌儀軌》中　〈花樽〉（局部）　朝鮮　憲宗十四年（184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9 粉地粉彩寶相花雙喜大碗 清道光
湖北省博物館藏



圖10 粉彩松綠地番蓮雙喜茶壺 清道光
Sotheby'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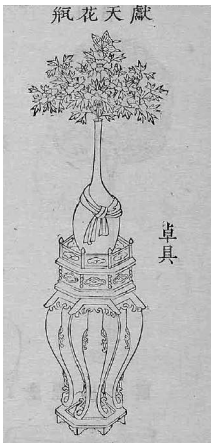


圖11 《戊子進爵儀軌》中 〈獻天花瓶〉
(局部) 朝鮮 純祖二十八年(1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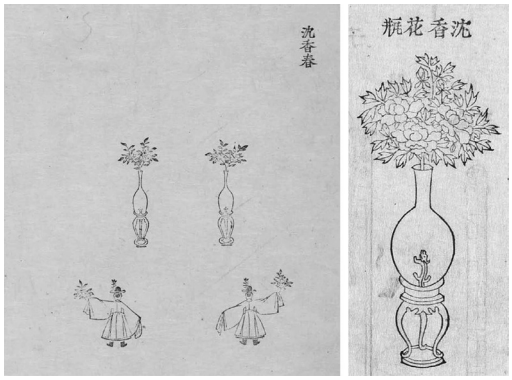


圖12 《戊子進爵儀軌》中 〈沈香花瓶〉
(局部) 朝鮮 純祖二十八年(1828)



圖13 粉彩折枝花卉紋盤 清雍正
景德鎮陶瓷博物館藏



圖14 粉彩黃地月季紋瓶(底部) 清乾隆
朝鮮 和柔翁主(1740-1777)墓出土
韓國 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5　粉彩黃地月季紋碗　清乾隆　日本　野崎家塩業歷史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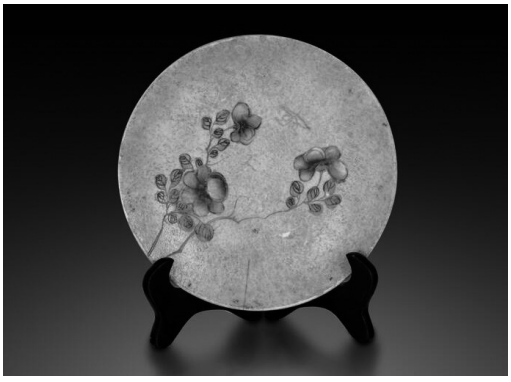


圖16　粉彩黃地月季紋盤　清
景德鎮市出土　景德鎮民窯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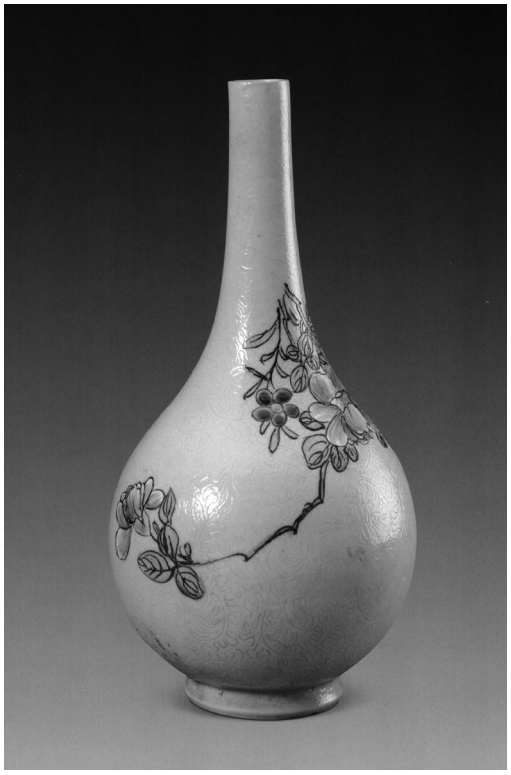


圖17　黃地軋道粉彩花卉紋膽瓶　清乾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日本肥前瓷器　朝鮮　元嬪洪氏（1766-1779）墓出土　韓國　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9 十九世紀朝鮮王室所用的清代琺瑯彩繪瓷器 韓國 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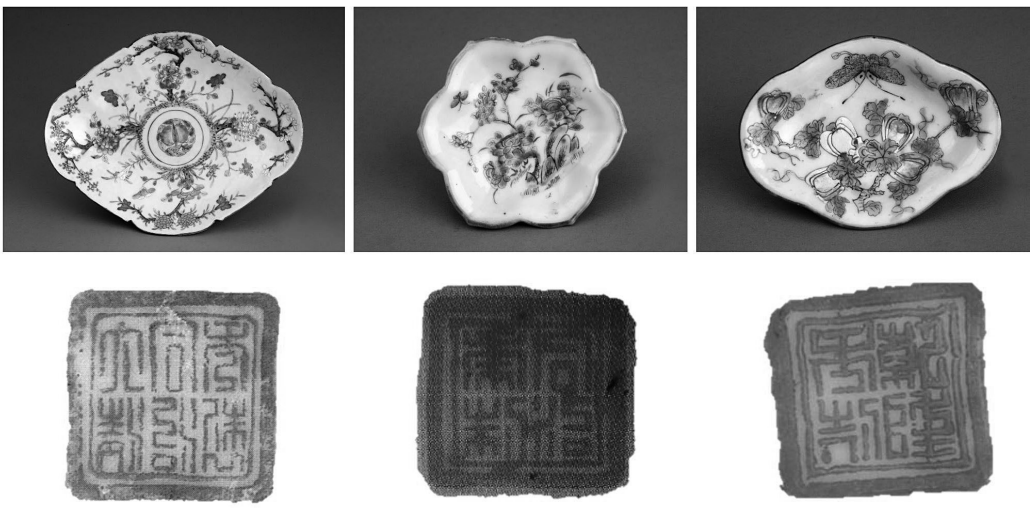


圖20 十九世紀朝鮮王室所用的清代琺琅彩瓷中的清末（同治-光緒）款式 韓國 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1　粉彩四節花卉紋碟　清　十九世紀
韓國　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圖22　粉彩花卉紋碟　清同治
新加坡　個人所藏



圖23　白菜蝴蝶紋罐　清　十九世紀　韓國　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圖24　五彩白菜紋碗　清　十九世紀
德化陶瓷博物館藏



圖25　廣彩白菜紋餐具套裝　清末民初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Christie's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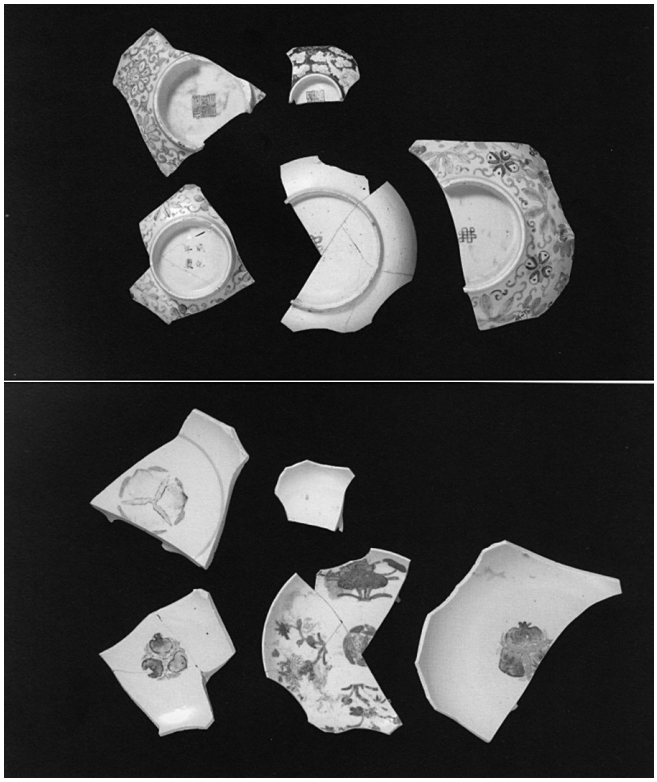


圖26 粉彩四節花卉紋碟片 清 十九世紀
景福宮咸和堂與緝敬堂出土
韓國 國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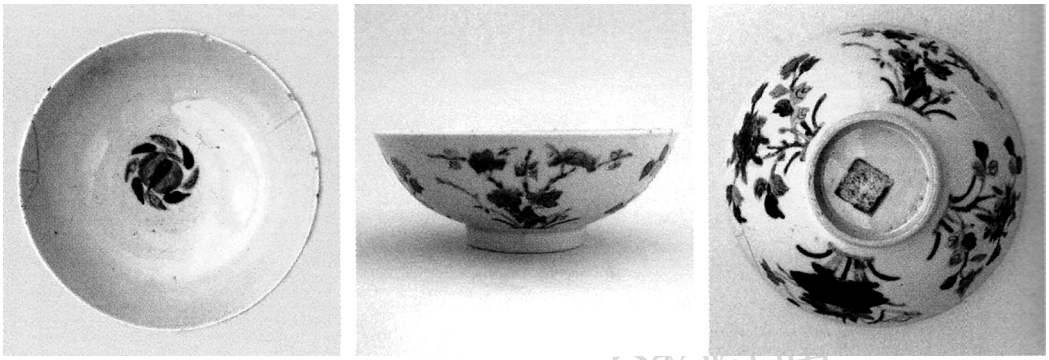


圖27 粉彩四節花卉紋碗 清 十九世紀 首爾鐘路區清進12-19地區出土 首爾歷史博物館藏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8　粉彩四節花卉紋碗及碟　清　十九世紀　首爾東大門運動場出土　首爾歷史博物館藏



圖29　粉彩花卉紋碗片　清　十九世紀　首爾毋岳2區出土　韓國　漢城百濟博物館藏



圖30　白瓷青畫器皿折枝紋湯器　朝鮮　十九世紀　韓國　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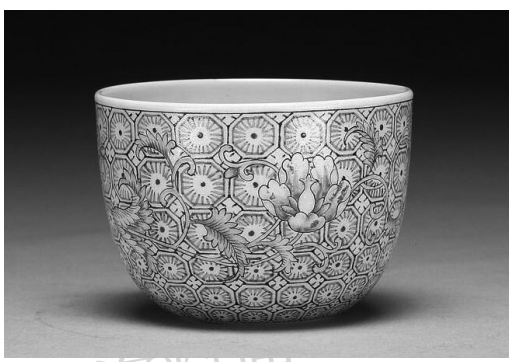


圖31　磁胎畫琺瑯錦上添花白地酒鍾　清乾隆　臺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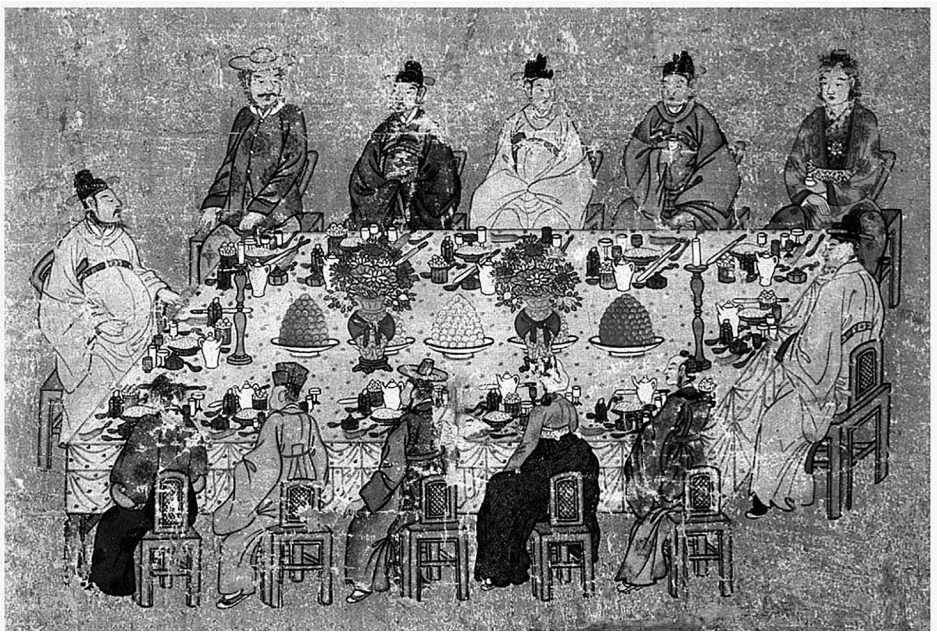


圖32 安中植 《韓日通商條約簽訂紀念宴會圖》 朝鮮 1883年
崇實大學韓國基督教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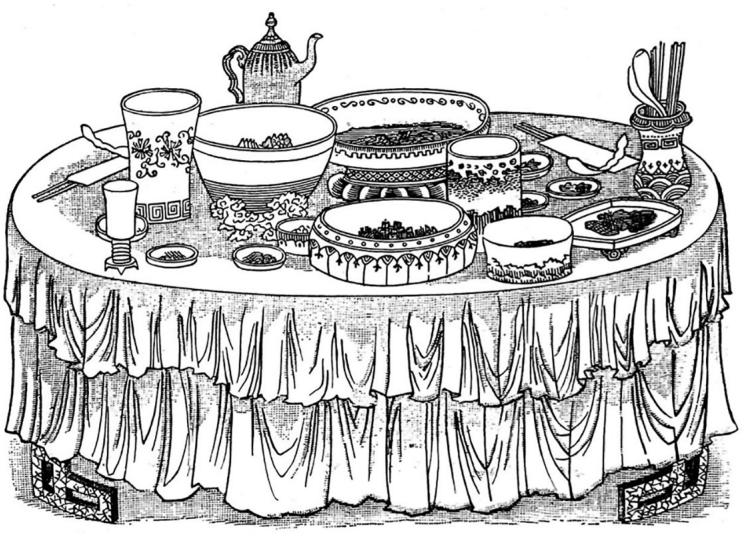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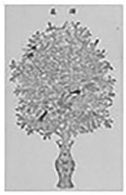


Table Spread for Festal Occasions.

圖33 William Elliot Griffis, *Corea, the Hermit Nation*,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4), p. 264 中的插圖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1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　朝鮮《儀軌》上出現的清代彩色瓷器

花樽							
獻天花瓶							
沈香花瓶							
牡丹花樽							
	戊子進爵儀軌 純祖二十八年 （1828）	戊申進饌儀軌 憲宗十四年 （1848）	戊辰進饌儀軌 高宗二年 （1868）	丁丑進饌儀軌 高宗十四年 （1877）	丁亥進饌儀軌 高宗二十四年 （1887）	壬辰進饌儀軌 高宗二十九年 （1892）	辛丑進饌儀軌 光武五年 （1901）
	1	2	3	4	5	6	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A Fundamental Study on the Introduction and Acceptance of Qing Enamel Painted Porcelain During the Joseon Dynasty

Kim, Eun-kyoung

Divis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vergence
Korea University

During the Joseon era, the predominant preference in ceramics was for unadorned white porcelain, reflecting the national ethos of prudence and austerity grounded in the Confucian principles. However, from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onwards, there was a notable surge in the consumption and importation of colored ceramics from China. Of particular interest were the emerging varieties known as *Falang* (“enamel”) or *Yang ci falang* (“enamel of foreign colors”), which began circulating, particularly within the Joseon royal court. It is highly likely that these varieties belong to the *Hua falang* (“polychrome painted enamel”), such as *Citai hua falang* (“tin-glazed enamel”) or *Tongtai hua falang* (“copper-body painted enamel”), produced in the Qing court. The excavated and passed-down objects are also related to the Joseon royal family, predominantly including the pieces of *Fencai* (“powder colored porcelain”) produced by Jingdezhen private kiln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Guangcai* (“Canton porcelain”) from Guangzhou.

The prominence of polychrome-enameled porcelain, embellished through the technique of “painting” with “enamel pigment,” within the Joseon royal court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suggests a departure from viewing colored pottery as a mere luxury. Instead, it is seen as projecting a sophisticated image in line with Joseon’s aspirations towards modernity. This shift indicates a deliberate effort to align with contemporary trends, portraying Joseon as a self-assured modern nation capable of navigating the complexities of a rapidly evolving era.

Keywords: Joseon Dynasty, Joseon-Qing Exchange, Polychrome enameled porcelain, *Huafalang, Fencai, Guangcai*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